

唐至北宋時期賓禮的禮儀空間

朱 溢*

摘 要

本文以禮儀空間為視角，來探討唐至北宋賓禮制度及其實踐的變遷。賓禮禮儀空間的變化，既受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對外形勢的左右。無論是唐後期蕃使來朝時的正衙禮見、後殿對見的形式，還是五代時期朝見禮儀空間的前移，抑或是北宋的蕃使朝見禮儀皆在內朝舉行的事實，都證明了賓禮的禮儀空間與皇帝的日常政治空間之間顯著的關聯性。另一方面，這一時期賓禮禮儀空間的差異與周邊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唐代以蕃主和蕃使為單位來制定賓禮，禮儀差別主要出現在蕃主和蕃使之間，而非不同政權之間。不同政權的蕃使在賓禮上的差別不大，在禮儀程序、禮儀空間上也沒有什麼不同，這在唐朝的賓禮實踐中基本上得到了體現。隨著對外形勢的變化，周邊政權的強弱在賓禮上有了更加直觀的反映，尤其是在澶淵之盟後，為了應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宋朝根據不同的國家制定不同的蕃使來朝禮儀。這些蕃使來朝禮儀之間存在著落差，尤其是契丹使者來朝禮儀的規格遠遠高於其他蕃使，這在禮儀空間上有充分體現。

關鍵詞：唐、北宋、賓禮、禮儀空間、朝見禮儀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職位等同副教授）

本文為上海市社科規劃課題「唐宋賓禮研究」（2014BLS002）、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項目「賓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以唐宋時期為中心」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感謝匿名審查人啟發思路、指正疏失，本文在修訂過程中充分參考、吸收了這些意見和建議。限於個人能力，對審查人所提個別問題的回應恐怕未能盡善，這將成為我日後繼續思考、探討相關問題的動力。

投稿日期：2013.7.15；接受刊登日期：2014.3.7；最後修訂日期：2014.12.30

Ritual Spaces of Foreign Guests in the Tang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Zhu, Y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ul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e Rituals for Foreign Guests (*Bin Li*) in the Tang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spaces. The ritual spaces of foreign guests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veryday monarchical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ang Dynasty, imperial audience rituals were conducted in the inner basilicas, while the foreign guests had to salute in the formal basilica where the emperor was absent. In the Five Dynasties, numerous imperial audience rituals were performed in the formal basilica.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imperial audience rituals were exclusively held in the inner basilicas again. The movements of the ritual space of imperial audiences all refle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rrangement of rituals and everyday monarchical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ituals for Foreign Guests in Tang and Northern Song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the totally different situation surrounding the country. The Rituals for Foreign Guests in the Tang Dynasty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for sovereigns and the other for tributary envoys. The gaps in ritual standards mainly lied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Received July 15, 2013; accepted March 7, 2014; last revised December 30, 2014.

between the sovereigns and envoys, not among the different neighboring regimes, which could be testified by the ritual procedure and ritual space. With the radical change in foreign relations, especially after the Treaty of Chanyuan, the strength of the outlying regimes was expressed in the Rituals for Foreign Guests. Under the Northern Song, the rituals for envoys were draf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oreign states. In particular, the rituals for Khitan envoys were much more ceremonious than those for tributary envoy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gaps in ritual standards of foreign envoys were therefore reflected in the ritual space.

Keywords: Tang Dynasty, Northern Song Dynasty, Rituals for Foreign Guests, Ritual Space, Imperial Audience Ritual

壹、引言

在《周禮》中，禮儀制度分爲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和嘉禮五類。西晉以降，國家禮制以《周禮》中的五禮爲基本框架，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帝制時代結束。¹近年來，禮制史研究呈現蒸蒸日上的勢頭，相關論著層出不窮，堪稱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活力的領域之一。

就唐宋賓禮而言，相關的研究論著主要有以下這些：田島公的研究涉及唐代的賓禮，重點在於日本對唐代賓禮的吸收和實踐；²王貞平考察了唐朝接待日本使者的諸項禮儀及其意識形態基礎；³石見清裕復原了唐代的蕃主蕃使謁見皇帝禮儀、皇帝宴請蕃主蕃使禮儀、國書授與禮儀，並對其中的一些關鍵環節作了解說和論述；⁴古瀨奈津子結合《開元禮》的文本規定和日本遣唐使的實例，對唐代的賓禮進行了全面研究；⁵森公章根據有關遣唐使的記載，探討了唐代的賓禮如何應用於與日本的交往；⁶藤善真澄以日本來華僧人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的記載爲例，分析了北宋賓禮的實行狀況；⁷廣瀨憲雄指出，從晚唐至北宋，中原王朝的皇帝用外交禮儀極力維護與周邊政權君長的君臣關係，但是因爲澶淵之盟的影響，不得不對契丹實行對等的外交禮儀。⁸儘管有這些研究成果，與吉禮、凶禮和嘉禮研究的深入開展相比，賓禮的討論還顯得較爲欠缺。

唐宋賓禮研究的薄弱主要受制於文獻記載的缺乏，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與賓禮相關的文獻總量不多；其次，在這些爲數有限的史料中，各項賓禮儀式

¹ 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26-146。

² 田島公，〈日本の律令國家の「賓禮」——外交儀禮より見た天皇と太政官〉，《史林》，第 68 卷第 3 號（京都：史學研究會，1985.5），頁 369-420。

³ 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頁 36-70。

⁴ 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國際秩序》（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 413-500；〈唐の國書授與儀禮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 57 卷第 2 號（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98.9），頁 243-276。

⁵ 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 107-149。

⁶ 森公章，《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對外政策》（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頁 2-19。

⁷ 藤善真澄，《參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6），頁 283-317。

⁸ 廣瀨憲雄，《東アジアの國際秩序と古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頁 236-277。

的文本規定又占了很大比重；最後，涉及賓禮實際運作的史料往往十分簡潔，缺少可供分析的豐富信息，通常只有見辭禮儀或宴會禮儀的時間、地點、人物等最基本的要素。不過，在這些有限的信息中，禮儀場所還是具有比較高的研究價值，有助於部分地揭示賓禮運行的實相。

國家禮儀以皇帝為中心而制定，因此都城成為舉行國家禮儀的主要舞臺。根據內容和性質的不同，有些禮儀在都城內舉行，也有些禮儀在都城的郊外舉行。例如，《周禮·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⁹宗廟和社稷建在都城內，五帝的祭壇建於都城的四郊。過去妹尾達彥對唐代長安的禮儀空間進行過精彩的研究，該文堪稱禮制研究的名篇。根據他對禮儀空間的定義，禮儀場所是點，在點的基礎上繼而形成線和面，這些點、線、面共同構成了禮儀空間。¹⁰妹尾達彥的唐代長安禮儀空間研究，偏重於分析各種祭祀禮儀（也就是五禮中的吉禮）在都城中的空間分布及其變質，對其他禮儀著墨不多。本文有意透過記載賓禮舉行地點的史料，來探討唐至北宋時期賓禮的禮儀空間，充實禮儀空間的研討，並期待以此能夠對唐宋賓禮研究有所推進。

貳、唐前期賓禮的禮儀空間

唐代編修過三部禮典——《貞觀禮》、《顯慶禮》和《開元禮》。《貞觀禮》共一百卷，一百三十八篇，其中賓禮四篇。¹¹四篇賓禮儀注的具體名稱不詳，但是內容大致清楚，即「賓禮則以待四夷之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來朝，遣使迎勞、授館、將幣、

⁹ 鄭玄（漢）注，賈公彥（唐）疏，《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19，頁766。

¹⁰ 妹尾達彥，〈唐長安城的儀禮空間——皇帝儀禮の舞臺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第72號（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2.3），頁1-35。

¹¹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21，〈禮儀志一〉，頁816-817。

擯享之節焉」。¹²《顯慶禮》共一百三十卷，二百二十九篇，¹³五禮各自所佔的卷數和篇數不見記載，不過其賓禮的內容想必與《貞觀禮》、《開元禮》相近，至少是以與蕃主、蕃使來朝有關的禮儀為主。

在《開元禮》中，賓禮共有兩卷，卷 79 是〈蕃國主來朝以束帛迎勞〉、〈遣使戒蕃主見日〉、〈蕃主奉見〉和〈受蕃國使表及幣〉，卷 80 是〈皇帝宴蕃國主〉和〈皇帝宴蕃國使〉，這顯然是按禮儀的進程來分卷的。如果從行禮者的身分來看，六項賓禮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蕃主來朝的禮節，包括〈蕃國主來朝以束帛迎勞〉、〈遣使戒蕃主見日〉、〈蕃主奉見〉、〈皇帝宴蕃國主〉；另一類是蕃使來朝的禮節，包括〈受蕃國使表及幣〉、〈皇帝宴蕃國使〉。蕃主來朝和蕃使來朝的儀節看似不同，實則不然，在〈受蕃國使表及幣〉有注：「其勞及戒見日，亦如上儀。」¹⁴也就是說，此篇包含了迎勞授館、確定朝見日期和舉行朝見禮儀的內容，且蕃使的迎勞授館和戒見日禮儀與蕃主相同。蕃主、蕃使來朝時，除了以上這些儀式外，還有朝辭之禮，因為與朝見相同，故沒有單獨列出條目，只是在〈蕃主奉見〉有注：「奉辭禮同。」¹⁵〈受蕃國使表及幣〉沒有明確說朝辭禮儀的程式與朝見禮儀相同，但是這應當不會有錯。可見，《開元禮》的賓禮囊括了蕃主、蕃使來朝禮儀的完整流程：迎勞授館、戒見日、朝見、宴會、朝辭。

在《開元禮》中，無論是蕃主來朝還是蕃使來朝，迎勞授館、戒見日這兩項禮儀都是在客館舉行，其儀式過程也沒有針對來者是蕃主還是蕃使而有所區分。在唐代，鴻臚客館一直作為朝廷的客館而存在。¹⁶鴻臚客館附屬於鴻臚寺，承擔接待蕃

¹² 王應麟（宋），《玉海》（南京、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卷 69，頁 1298。

¹³ 王溥（宋），《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 37，〈五禮篇目〉，頁 670。

¹⁴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東京：古典研究會，1972），卷 79，〈受蕃國使表及幣〉，頁 388。

¹⁵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79，〈蕃主奉見〉，頁 387。

¹⁶ 有學者認為，四方館也是隋唐朝廷用來接待蕃主或蕃使的客館，參見黎虎，《漢唐外交制度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頁 367-368；王靜，《中國古代中央客館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頁 77-80。但是石曉軍的研究表明，隋代的四方館是隋煬帝建在東都的臨時性外事主管官署，唐代的四方館隸屬於中書省，是隋代謁者臺的延續，主要負責處理帝國內外的各種公文書和貢獻物。參見石曉軍，〈隋唐四方館考略〉，《唐研究》，第 7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2），頁 311-325。我同意他的看法。

客的職責，根據《兩京新記》的遺文，「承天門西第七街北從東第一曰鴻臚寺，次西鴻臚客館」，注文曰：「如漢之橐街邸，四夷慕化及朝獻者之所居。」¹⁷因此，迎勞授館和戒見日兩項禮儀在位於宮城外、皇城內的鴻臚客館舉行。

與迎勞授館、戒見日相比，朝見、宴會、朝辭禮儀顯然更重要。朝見禮儀更是蕃客來朝的中心環節，對締結和維持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的關係甚是關鍵。朝見、宴會、朝辭禮儀都在宮城內舉行，因此宮城構成了賓禮實施的主要空間，這與吉禮皆在宮城之外舉行不同。

無論來者是蕃主還是蕃使，朝廷為他們舉行的迎勞授館、戒見日兩項儀式完全一致，待遇的差別主要體現在朝見、宴會、朝辭上，特別是朝見禮儀上。蕃主朝見禮儀的舉行地點是太極殿。前一日，「尚舍奉御鋪蕃主牀座於御座西南，東向」。舉行朝見禮儀時，蕃主由承天門外進入太極殿庭，向皇帝多次再拜稽首後，侍中秉皇帝之命，「承制降勞，敕令升座」，通事舍人引導蕃主升階至殿上蕃主牀就坐，以此表現中原王朝對蕃主的禮遇。¹⁸與此相對，蕃使朝見禮儀的舉行地點是「所御之殿」，也就是說蕃使朝見的禮儀場所並不固定。舉行朝見禮儀時，蕃使手捧國書進入殿庭，中書侍郎接受國書後，升殿奏稟皇帝。有司接收蕃使帶來的幣、馬。蕃使再拜後，通事舍人承皇帝敕命問安蕃主及其臣下，並勞問使節。¹⁹由此可見，蕃主與蕃使朝見禮儀的差別在禮儀進程、禮儀空間上皆有反映。就禮儀空間而言，蕃主朝見禮儀的地點明確為太極殿，在禮儀過程中，蕃主可以升殿坐於皇帝身邊，其隨從則在殿庭內行禮；蕃使朝見禮儀的地點不固定，蕃使只在殿庭內行禮。

與朝見禮儀有所不同，皇帝宴請蕃主、蕃使的場所都是在「所御之殿」，²⁰也就是說，宴會場所的選擇更加隨意一些。與只有蕃主纔能升殿拜見皇帝的朝見禮儀不同，無論在皇帝宴蕃主的禮儀中，還是在皇帝宴蕃使的禮儀中，都有一些使團成

¹⁷ 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卷1，頁11。

¹⁸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79，〈蕃主奉見〉，頁387-388。

¹⁹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79，〈受蕃國使表及幣〉，頁388-389。

²⁰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80，〈皇帝宴蕃國主〉，頁389；卷80，〈皇帝宴蕃國使〉，頁391。

員能夠升殿，另一部分成員則在殿下就座。在皇帝宴蕃主禮儀前，「尚舍奉御鋪蕃主牀座於御座西南，蕃國諸官應升殿者座於蕃主之後，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蕃主進入殿庭後，奉上贄物、土貢，由侍中代表皇帝接受贄物，之後是飲酒、進食的環節。²¹在皇帝宴蕃使禮儀前，「尚舍奉御鋪使者牀座於御座西南，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²²皇帝宴蕃主禮儀與宴蕃使禮儀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有蕃主奉上贄物、土貢的儀節；因為蕃使已在朝見禮儀上獻過幣、馬，所以後者在使者再拜後直接進入飲酒、進食的環節。古瀨奈津子推測，蕃主、蕃使都避免在與皇帝直接相見的儀式中獻上物品：在蕃主朝見禮儀中，他獨自升殿拜見皇帝，意義重大，故而將獻物環節轉移到賜宴儀式中；部分蕃使在宴會禮儀中與皇帝直接見面，而在蕃使朝見禮儀中，蕃使不是直接拜見皇帝，所以獻物儀節在朝見禮儀中進行。²³

從《開元禮》的規定來看，周邊政權的強弱親疏造成的賓禮上的差別，表現為蕃使朝見、宴會禮儀中樂懸和黃麾仗的有無：蕃使朝見唐朝皇帝時，「大蕃大使為作樂，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設樂懸及黃麾仗」；皇帝賜宴蕃使時，「若大蕃中使、小蕃大使等以下，則不設樂及黃麾仗」。²⁴各周邊政權的使節在賓禮的其他方面則沒有區別。《新唐書·儀衛志》：「元日、冬至大朝會、宴見蕃國王，則供奉仗、散手仗立於殿上；黃麾仗、樂縣、五路、五副路、屬車、輿輦、傘二、翰一，陳於庭。」²⁵《唐六典》說：「凡蕃國王朝見，皆設宮縣之樂及黃麾仗；若蕃國使，則減

²¹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80，〈皇帝宴蕃國主〉，頁 389-391。

²²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80，〈皇帝宴蕃國使〉，頁 391。

²³ 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國》，頁 133。

²⁴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79，〈受蕃國使表及幣〉，頁 388；卷 80，〈皇帝宴蕃國使〉，頁 391。
《開元禮》對周邊政權有大蕃、次蕃、小蕃的劃分，不過沒有指明大蕃、次蕃和小蕃具體是指哪些蕃國。在唐代，還有「蕃望」一說，「蕃望」共計五等，用於衡量周邊政權的等級。不過，由於史料所限，我們無法確知哪個國家對應哪等蕃望，也無從知曉五等蕃望與《開元禮》中的大蕃、次蕃、小蕃有無對應關係。關於蕃望問題的研究，參見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國際秩序》，頁 384-412；黎虎，《漢唐外交制度研究》，頁 319-322。

²⁵ 歐陽修、宋祁（宋），《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23 上，〈儀衛志上〉，頁 483。

黃麾之半。」²⁶黃麾仗和樂懸置於殿庭中，用於表現儀式的莊嚴隆重，黃麾仗和樂懸的有無當然會影響到禮儀的規格，不過，無論從禮儀進程還是從禮儀空間來看，不同周邊政權的使者在朝見、宴會禮儀上沒有什麼不同。

在《開元禮》中，只有蕃主朝見禮儀的地點明確為太極殿，蕃使朝見禮儀、蕃主和蕃使的宴會禮儀則在「所御之殿」舉行，但是這裡的「所御之殿」限定於太極宮的宮殿。《開元禮》但凡涉及宮城之處，皆是以太極宮為背景。太極宮始建於隋代開皇二年（582），原名大興宮，唐朝建立後繼續以此為宮城。宮內最重要的建築自南而北依次是承天門、太極殿和兩儀殿，它們在《唐六典》中分別被比作上古的外朝、中朝和內朝。²⁷上古宮城分為三朝的觀念至少在漢代就已經出現。鄭玄認為，西周天子的宮城有五門三朝，五門自外而內分別是皋門、庫門、雉門、應門和路門，皋門與庫門之間稱為外朝，庫門與路門之間稱為治朝，路門之內稱為燕朝。²⁸楊寬指出，經典中的三朝帶有早期統治階級內部民主的殘餘，太極宮的建立意味著新的三朝制度的正式成形，適應了朝會制度發展的需要。²⁹

《唐六典》說，「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太極殿的主要功能是「朔望則坐而視朝」，兩儀殿則用於「常日聽政而視事」。³⁰這一說法被廣為接受，但卻有可能存在

²⁶ 李林甫（唐）等，《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4，禮部郎中員外郎條，頁114。

²⁷ 李林甫（唐）等，《唐六典》，卷7，工部郎中員外郎條，頁217。

²⁸ 鄭玄（漢）注，賈公彥（唐）疏，《周禮注疏》，卷2，頁650；卷35，頁877。

²⁹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171-172。

³⁰ 李林甫（唐）等，《唐六典》，卷7，工部郎中員外郎條，頁217。此處所說的「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的行為，發生於正旦、冬至大朝會，尤其是正旦大朝會。渡邊信一郎的研究表明，在漢唐時期的元會禮儀上，州郡定期獻上貢賦和版籍，羈縻州不定期獻上貢賦和版籍，蕃夷不定期獻上土貢，對帝國秩序的展現甚為重要。參見氏著，《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と儀禮》（東京：柏書房，1996），頁237-247。而《開元禮》規定的蕃主、蕃使見辭唐朝皇帝的制度，則是針對平時蕃客來朝的場合。另外，學者們對太極殿、兩儀殿的功能區分也有不同認識，渡邊信一郎、古瀨奈津子和松本保宣都肯定《唐六典》的說法，認為太極殿和兩儀殿分別用於朔望朝參和常朝；吉田歡的看法不同，唐朝建立後以太極殿為常朝之地，睿宗朝確立了在兩儀殿舉行常朝的制度。參見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と儀禮》，頁93-94；古瀨奈津子，《日本古代王權と儀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71-77；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會議——唐代聽政制度の展開》（京都：晃洋書房，2006），頁255-258；吉田歡，《日中宮城の比較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94-99。

問題：首先，我們沒有發現在承天門舉行過正旦、冬至大朝會的記錄；其次，從現有的史料蒐集情況來看，承天門與朝會關係不大，主要功能為下達重要詔書，尤其是大赦天下的詔文，³¹有時承天門還用來舉行宴會。³²再次，《開元禮》有正旦、冬至大朝會在太極殿舉行的規定。³³儘管同樣無法找到正旦、冬至大朝會曾經在太極殿舉行的例證，而且《開元禮》頒布前後正旦、冬至大朝會多在大明宮的含元殿舉行，³⁴不過《開元禮》的規定至少表明，此時正旦、冬至大朝會如果在太極宮舉行，那麼法定的行禮地點應該是太極殿。

雖說龍朔二年（662）大明宮的興建、次年高宗的移宮降低了太極宮的重要性，不過，後來的中宗、睿宗、玄宗、昭宗等皇帝都曾經居住於此，而且太極殿一直具有很重要的禮儀功能。從史料記載看，中宗、代宗、德宗、順宗死後，在太極宮停柩或發喪，³⁵德宗、順宗、穆宗和敬宗即位於太極殿。³⁶金子修一的研究更是表明，唐代皇帝的即位禮儀根據他是接受前任皇帝的傳位還是讓位而有異，由傳位而登基的皇帝之即位禮儀分為兩個階段，對其中的大部分皇帝來說，即位的第二階段都是在太極殿進行柩前即位或受冊即位。³⁷從開元五年（717）「太廟屋壞，移神主於太極殿」的記載來看，太極殿還曾起到臨時太廟的作用。³⁸在《開元禮》中，太極殿的禮儀功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皇帝親自舉行郊祀、太廟、籍田等祭祀禮儀時，

³¹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7，〈睿宗紀〉，頁154；卷8，〈玄宗紀上〉，頁169；卷18上，〈武宗紀〉，頁603；卷20上，〈昭宗紀〉，頁739；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80，〈帝王部・慶賜二〉，頁869；卷85，〈帝王部・赦宥三〉，頁934。

³²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80，〈帝王部・慶賜二〉，頁873。

³³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97，〈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頁452。渡邊信一郎明確指出，正旦、冬至大朝會在太極宮的太極殿和大明宮的含元殿舉行。參見氏著，《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頁94。

³⁴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107，〈帝王部・朝會一〉，頁1166-1167。

³⁵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7，〈中宗紀〉，頁150；卷11，〈代宗紀〉，頁315；卷13，〈德宗紀下〉，頁400；卷14，〈憲宗紀上〉，頁414。

³⁶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12，〈德宗紀上〉，頁319；卷14，〈順宗紀〉，頁405；卷16，〈穆宗紀〉，頁475；歐陽修、宋祁（宋），《新唐書》，卷8，〈敬宗紀〉，頁227。

³⁷ 金子修一，《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488-505。

³⁸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頁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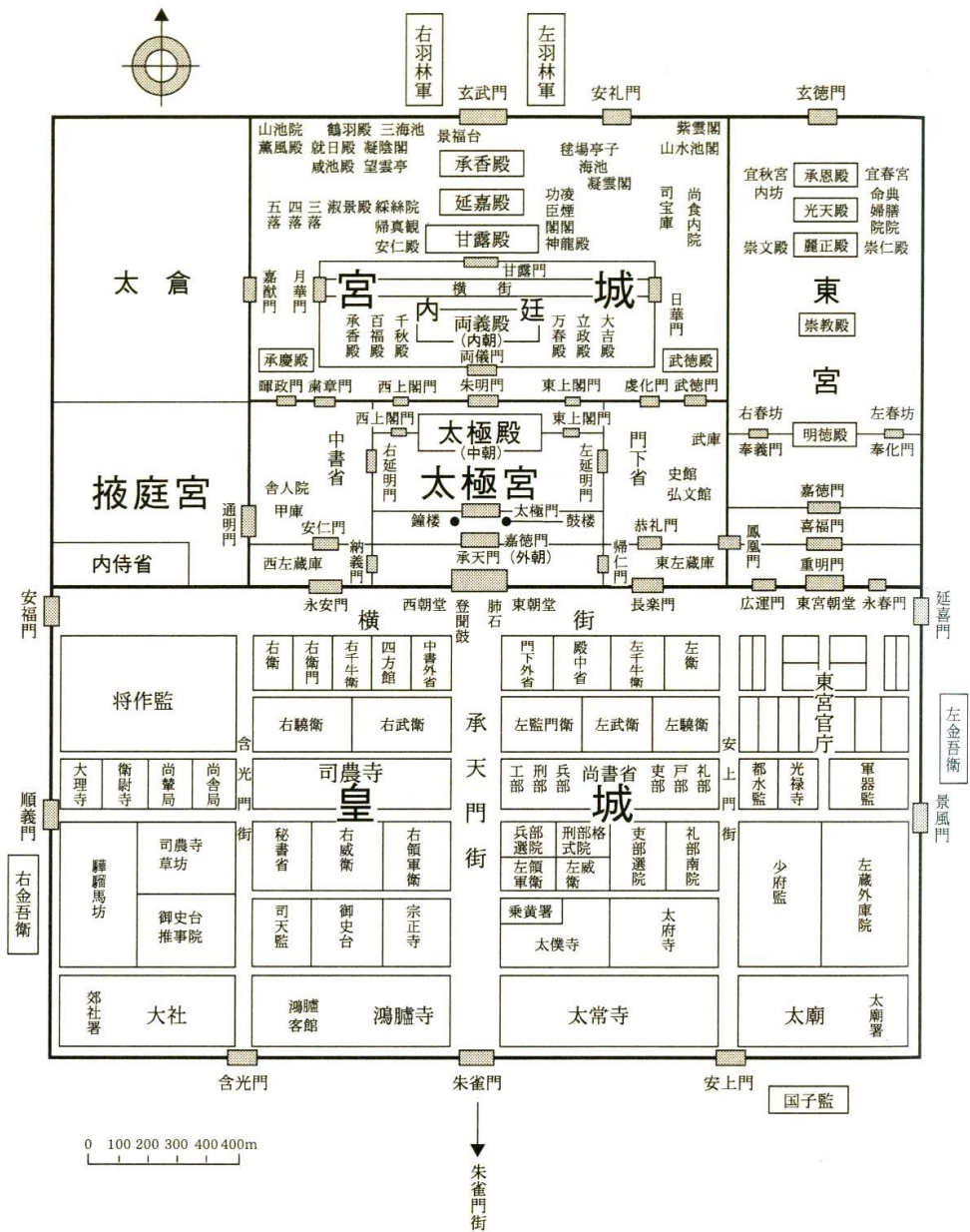
在太極殿致齋，並乘坐玉輅前往祭祀地點；³⁹皇帝巡狩或出征前有各種告祭儀式，齋戒活動也在太極殿舉行；⁴⁰在正旦、冬至大朝會、朔日受朝、讀時令、皇帝加元服、納后、冊封太子、諸王、大臣、皇太子加元服、納妃、公主降嫁等嘉禮儀式中，太極殿也是主要的禮儀場所。⁴¹將蕃主見辭唐朝皇帝的禮儀置於太極殿，亦與太極殿極強的禮儀功能有關。

³⁹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4，〈皇帝冬至祀圓丘〉，頁 35、38；卷 6，〈皇帝正月上辛祈穀於圓丘〉，頁 50、52；卷 10，〈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頁 73、75；卷 29，〈皇帝夏至日祭方丘〉，頁 165、168；卷 37，〈皇帝時享於太廟〉，頁 203、205；卷 39，〈皇帝祫享於太廟〉，頁 220、223；卷 41，〈皇帝禘享於太廟〉，頁 236、239；卷 46，〈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耕籍〉，頁 262、264。

⁴⁰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56，〈皇帝巡狩告於圓丘〉，頁 307；卷 58，〈皇帝巡狩告於太社〉，頁 311；卷 60，〈皇帝巡狩告於太廟〉，頁 316；卷 81，〈皇帝親征類於上帝〉，頁 393；卷 82，〈皇帝親征宜於太社〉，頁 396；卷 83，〈皇帝親征告於太廟〉，頁 399。

⁴¹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91，〈皇帝加元服上〉，頁 428；卷 93，〈納后上〉，頁 435；卷 95，〈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朝賀〉，頁 449；卷 97，〈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頁 452；卷 103，〈太極殿讀令〉，頁 491；卷 105，〈臨軒冊命皇后〉，頁 496；卷 106，〈臨軒冊命皇太子〉，頁 500；卷 107，〈內冊皇太子〉，頁 504；卷 108，〈臨軒冊命諸王大臣〉，頁 507；卷 109，〈朔日受朝〉，頁 510；卷 110，〈皇太子加元服〉，頁 511；卷 111，〈皇太子納妃〉，頁 519；卷 116，〈公主降嫁〉，頁 546。

朱泚／唐至北宋時期賓禮的禮儀空間



【圖一】 唐代長安太極宮圖

資料來源：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劃》（東京：講談社，2001），頁 123。

儘管《開元禮》中的蕃客見辭、宴會禮儀皆以太極宮為禮儀場所，然而在皇帝以大明宮為主要宮殿的背景下，大明宮勢必越來越多地用於蕃客見辭、宴會禮儀的舉行。在大明宮中，自南而北最重要的建築分別是丹鳳門、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根據《唐六典》的注文，元正、冬至大朝會在含元殿舉行，其夾殿兩閣前有朝堂、肺石、登聞鼓，「如承天之制」，紫宸殿則被釋為「內朝正殿」，⁴²所以很多學者認為，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分別與太極宮的承天門、太極殿、兩儀殿相當，是外朝、中朝和內朝的正殿。就宮城的形制結構而言，的確如此，承天門和含元殿的兩側都有東西朝堂、肺石和登聞鼓，太極殿和宣政殿的兩側都有東、西上閣門。然而從功能來看，這些宮殿之間並非一一對應。與承天門功用接近的是大明宮的正南門丹鳳門，主要也是用於頒宣赦詔。⁴³大明宮的正殿含元殿與太極殿相似，最主要的功能是舉行正旦、冬至大朝會。⁴⁴含元殿有時也用於向帝后上尊號，⁴⁵或是皇帝在此宴請群臣、⁴⁶親試考生。⁴⁷含元殿以北的宣政殿「即正衙殿也，朔望大冊拜則御之」。⁴⁸宣政殿亦曾用於舉行常朝，開元以降，皇帝越來越多地在紫宸殿接受常參官的朝見。

⁴² 李林甫（唐）等，《唐六典》，卷 7，工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217。

⁴³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80，〈帝王部·慶賜二〉，頁 880、881；卷 87，〈帝王部·赦宥六〉，頁 959、963；卷 88，〈帝王部·赦宥七〉，頁 971；卷 89，〈帝王部·赦宥八〉，頁 980、981、982、984、985、987、988、989、990；卷 90，〈帝王部·赦宥九〉，頁 992、994、995、996、997、998、999；卷 91，〈帝王部·赦宥十〉，頁 1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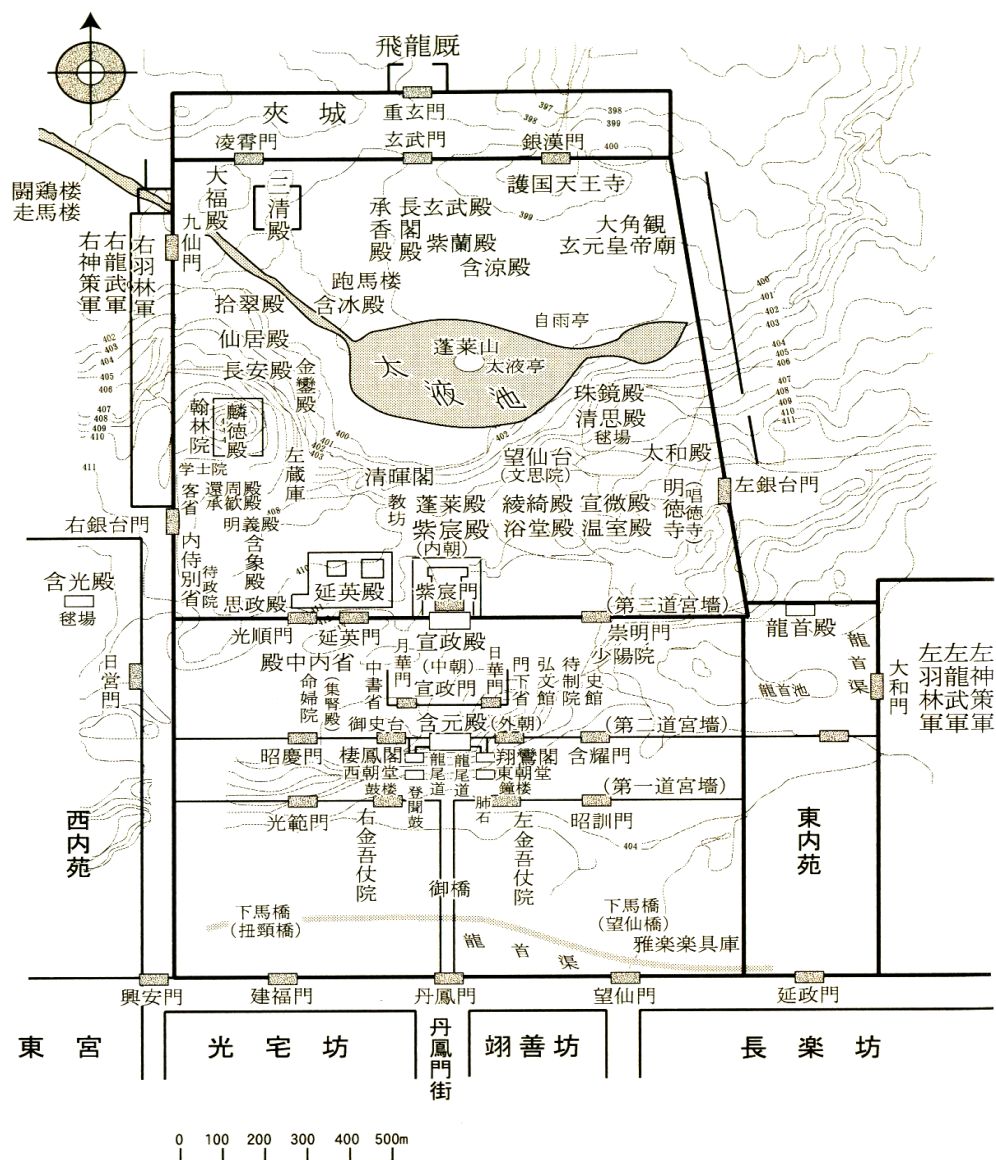
⁴⁴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107，〈帝王部·朝會一〉，頁 1166-1171；卷 108，〈帝王部·朝會二〉，頁 1174。

⁴⁵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86，〈帝王部·赦宥五〉，頁 952；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 24，〈禮儀志四〉，頁 927；歐陽修、宋祁（宋），《新唐書》，卷 77，〈睿真沈太后傳〉，頁 3501。

⁴⁶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110，〈帝王部·宴享二〉，頁 1197、1198。

⁴⁷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643，〈貢舉部·考試〉，頁 7426、7428。

⁴⁸ 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卷 1，頁 6。



【圖二】 唐代長安大明宮圖

資料來源：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劃》，頁 177。

接下來，我們來看蕃客朝見、宴會場所的實例。安史之亂前蕃客朝見唐朝皇帝的場所，在史料中記載不多，我們只找到了兩條，來者都是吐蕃使者。第一條是《唐會要》的記載。開元二年（714）五月，「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及御史名悉獵來獻盟書。玄宗御承天門樓，命有司引見。置酒於內殿，宴遣之」。⁴⁹此時唐玄宗居住在太極宮，⁵⁰因此在承天門接受了吐蕃使者的朝謁。第二條史料出現於《舊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八年十月，名悉獵等至京師，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⁵¹開元十六年正月，玄宗「始聽政於興慶宮」，⁵²興慶宮的前身是玄宗登基前的舊邸興慶坊，開元二年改稱為宮，雖然後來有過擴建，但是規模總歸有限，殿庭也不夠壯觀，重要禮儀還是在大明宮舉行，因此吐蕃使者名悉獵的朝見禮儀在宣政殿舉行。從上面兩個例子來看，吐蕃使者是在氣勢恢宏、極具象徵意義的前朝宮殿朝見唐朝皇帝。

表 1 列舉了有明確記載的宴會禮儀場所，這些宴會都發生在《開元禮》頒布以前。我們看到，宴饗蕃使的場所有太極殿、兩儀殿、安福門、丹鳳樓、紫宸殿、麟德殿、苑內球場、宿羽亭等。太極殿、兩儀殿、丹鳳樓、紫宸殿在前文已有介紹。安福門位於分隔太極宮和皇城的橫街的西端。麟德殿在大明宮中，位於紫宸殿的西北方，比紫宸殿更加靠近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宿羽亭又稱宿羽臺，在興建於調露元年（679）的東都洛陽宿羽宮中，⁵³而宿羽宮是禁苑的一部分。⁵⁴唐代長安有三內苑，分別是禁苑、西內苑和東內苑，根據史料記載，至少禁苑和東內苑都有馬球場，⁵⁵我們不能斷言景龍三年（709）宴饗吐蕃使的苑內球場究竟指哪座馬球場，但是其

⁴⁹ 王溥（宋），《唐會要》，卷 97，〈吐蕃〉，頁 1732。

⁵⁰ 唐玄宗於開元二年（714）六月遷至大明宮，見歐陽修、宋祁（宋），《新唐書》，卷 5，〈玄宗紀〉，頁 123。

⁵¹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 196 上，〈吐蕃傳上〉，頁 5231。

⁵²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 8，〈玄宗紀上〉，頁 192。

⁵³ 司馬光（宋），《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207，長安三年十一月丙寅條，頁 6568。

⁵⁴ 李林甫（唐）等，《唐六典》，卷 7，工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222。

⁵⁵ 妹尾達彦，〈隋唐長安城的皇室庭園〉，收入橋本義則編，《東アジア都城の比較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頁 298-299。

空間位置遠離前朝是毫無疑問的。以上這些表明，宴會場所的選擇隨意性更強，⁵⁶畢竟宴會禮儀在對外交往中的意義不及朝見禮儀，後來的《新五代史·李琪傳》就說：「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⁵⁷這與《開元禮》沒有嚴格規定皇帝設宴招待蕃主和蕃使的場所有相通之處。《開元禮》頒布後，仍不時可以見到皇帝賜宴蕃使的記載，但是禮儀場所皆以「內殿」稱之，⁵⁸無法確認具體的宮殿名稱，不過這依然能夠說明，唐前期的蕃客宴會場所往往更加靠近內宮。

【表 1】安史之亂前的蕃使宴會禮儀場所

時間	場所	對象	史料來源（卷/頁）
武德元年（618）	太極殿	突厥使	《舊唐書》194 上/5154
貞觀十六年（642）	兩儀殿	諸蕃使	《冊府元龜》974/11274
長安二年（702）	麟德殿	吐蕃使	《舊唐書》196 上/5226
長安三年（703）	宿羽亭	突厥使	《舊唐書》194 上/5170
長安三年（703）	麟德殿	日本使	《舊唐書》199 上/5341
景龍二年（708）	兩儀殿	堅昆使	《冊府元龜》974/11275
景龍三年（709）	苑內球場	吐蕃使	《舊唐書》196 上/5226
太極元年（712）	安福門	突厥使	《冊府元龜》979/11331
開元元年（713）	三殿（麟德殿）	吐蕃使	《冊府元龜》980/11344
開元七年（719）	丹鳳樓	九姓同羅、契丹使	《冊府元龜》974/11277
開元十五年（727）	紫宸殿	突厥使	《舊唐書》194 上/5177
開元十八年（730）	丹鳳樓	突騎施使	《舊唐書》194 下/5191

⁵⁶ 王海燕認為，唐朝根據與對方政治關係的強弱來使用不同的外交禮儀空間，並列舉了一些例子。她試圖用上引長安二年和開元十八年的事例，證明隨著唐朝與吐蕃的關係從君臣關係變為會盟關係，唐朝採用的禮儀空間從內朝麟德殿轉到中朝宣政殿。參見氏著，《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間與禮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2-125。不過，她的這一觀點不能成立。首先，朝見和宴會是不同的禮儀，需要進行區分。其次，在唐後期，與其他蕃使一樣，吐蕃使臣一般在麟德殿朝見唐朝皇帝，如果此時唐與吐蕃是相對平等的會盟關係，那麼如何解釋吐蕃使者在內殿朝見唐朝皇帝的事實呢？

⁵⁷ 歐陽修（宋），《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54，〈李琪傳〉，頁 618。

⁵⁸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975，〈外臣部·褒異二〉，頁 11286-11287。

參、唐後期賓禮的禮儀空間

賓禮的禮儀空間在唐後期的變化非常值得關注。首先是迎勞授館、戒見日禮儀場所的變動。這一時期，禮賓院成為鴻臚客館之外另一個接待蕃客的朝廷客館。禮賓院建立的時間不詳。據記載，天寶十三載（754），「禮賓院自今後，宜令鴻臚勾當檢校，應緣供擬，一物已上，並令鴻臚勾當」，⁵⁹由此可見禮賓院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這時確定由鴻臚寺主管。安史之亂後，禮賓院成為內諸司之一，其主管禮賓使由宦官充任。⁶⁰這一機構是招待周邊政權使者的重要宿泊設施，開成三年（838）日本遣唐使到達長安後，就住在禮賓院。⁶¹在晚唐皇帝發布的赦文中，經常出現「鴻臚、禮賓院蕃客」的表述，⁶²就是將鴻臚客館和禮賓院的蕃客相提並論。至少可以確認，元和九年（814）後，禮賓院的地點在長興里之北。⁶³因此，除了鴻臚客館外，晚唐的迎勞授館、戒見日禮儀也有可能在禮賓院舉行，禮賓院在皇城外，但是距離皇城南界並不遠。

與唐前期不同的是，唐後期蕃主、蕃使朝見皇帝場所的記載異常豐富。廣瀨憲雄對此作了細緻的整理，他指出，肅宗、代宗朝的蕃客朝見禮儀多在延英殿、右銀臺門舉行，尤其是以延英殿為主，右銀臺門限於舉行回鶻使者的朝見禮儀，從德宗統治時期開始，蕃使朝見禮儀改在麟德殿舉行。⁶⁴通過相關史料的蒐集和檢驗可以發現，他的看法是準確的。同時，我們注意到周邊政權的文獻記錄也可證實這一點。

⁵⁹ 王溥（宋），《唐會要》，卷 66，〈鴻臚寺〉，頁 1151。

⁶⁰ 趙兩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官僚機構與等級之編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97。

⁶¹ 圓仁（日）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卷 1，開成四年正月廿一日條，頁 103。

⁶² 李昉（宋）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 420，〈大中十三年十月九日嗣登寶位赦〉，頁 2128；卷 422，〈大中二年正月三日冊尊號赦書〉，頁 2138；卷 422，〈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號赦〉，頁 2140；卷 423，〈寶曆元年四月二十日冊尊號赦文〉，頁 2142；卷 423，〈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尊號赦文〉，頁 2145；卷 427，〈寶曆元年正月七日赦文〉，頁 2165；卷 428，〈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頁 2170；卷 429，〈會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頁 2176；卷 430，〈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赦文〉，頁 2181。

⁶³ 王溥（宋），《唐會要》，卷 66，〈鴻臚寺〉，頁 1152。

⁶⁴ 廣瀨憲雄，《東アジアの國際秩序と古代日本》，頁 251。

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新羅惠恭王九年（773）六月，「遣使如唐謝恩，代宗引見於延英殿」，十年十月，「遣使如唐賀正，見於延英殿，授員外衛尉卿遣之」。⁶⁵憲德王十二年（820）十一月，「遣使入唐朝貢，穆宗召見麟德殿」。⁶⁶興德王三年（828），「遣使入唐朝貢，文宗召對於麟德殿」。⁶⁷我們在後文會提到日本遣唐使的經歷，那些史料同樣能夠說明，在朝見禮儀場所的選擇上，肅、代兩朝和德宗朝以降是不同的。延英殿在紫宸殿的西南方，宣政殿西面的西上閣門的西側是延英門，延英門內有兩座宮殿，東邊為延英殿，西邊為含象殿。⁶⁸麟德殿位於紫宸殿的西北方，又稱為「三殿」，⁶⁹建築史家認為，「三殿」是指主殿由前殿、中殿和後殿相連。⁷⁰

需要留意的是，中國、朝鮮史料中所見到的晚唐蕃使朝見禮儀場所的記載很有可能是不完整的，肅宗、代宗時期的延英殿朝見和德宗朝以降的麟德殿朝見，恐怕只是整個朝見過程的一部分。這在日本遣唐使回國以後的報告中有反映。寶龜八年（大曆十二年，777）六月，日本派出了以佐伯今毛人為大使的遣唐使團，根據判官小野滋野回國後的彙報，次年正月十五日，遣唐使「於宣政殿禮見，天子不衙。是日，進國信及別貢等物。天子非分喜觀，班示群臣。三月廿二日，於延英殿對見，所請並允。即於內裏設宴，官賞有差」。⁷¹延曆二十三年（貞元二十年，804）七月，日本又一次派出遣唐使團，歸國之後，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報告了他在長安朝見唐德宗的經歷。十一月廿四日，「國信、別貢等物附監使劉昂進於天子。劉昂歸來，宣敕云：『卿等遠慕朝貢，所奉進物，極是精好，朕殊喜歡。時寒，卿等好在。』」廿五日，於宣化殿禮見，天子不衙。同日，於麟德殿對見，所請並允。即於內裏設宴，

⁶⁵ 金富軾（高麗）等，《三國史記》（東京：國書刊行會，1971），卷9，〈新羅惠恭王紀〉，頁107。

⁶⁶ 金富軾（高麗）等，《三國史記》，卷10，〈新羅憲德王紀〉，頁118。

⁶⁷ 金富軾（高麗）等，《三國史記》，卷10，〈新羅興德王紀〉，頁121。

⁶⁸ 李林甫（唐）等，《唐六典》，卷7，工部郎中員外郎條，頁218。

⁶⁹ 錢易（宋），《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丙部，頁36；王應麟（宋），《玉海》，卷160，頁2931；司馬光（宋），《資治通鑑》，卷207，長安二年九月癸未條胡注，頁6560。

⁷⁰ 郭湖生，〈麟德殿遺址的意義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1.11），頁619-624、630；劉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復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第7期（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3.7），頁385-402。

⁷¹ 菅原真道（日），《續日本紀》（東京：吉川弘文館，1961），卷35，寶龜九年十月乙未條，頁443-444。

官賞有差」。⁷²「宣化殿」無疑是宣政殿之誤。正如前文所述，在大明宮中，宣政殿是正衙，「天子不衙」就是指皇帝不御宣政殿。以上兩條史料有兩方面的價值。第一，可以進一步證明，肅、代時期蕃使主要是在延英殿朝見皇帝，德宗朝以後改在麟德殿舉行這一禮儀。第二，古瀨奈津子根據這些史料敏銳地指出，蕃使在延英殿或麟德殿見到皇帝前，先要在宣政殿進行禮見。⁷³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發現。其實，這樣的記載在中國的傳世文獻中雖然罕見，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反映。根據《冊府元龜》的記載，會昌六年（846）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使「朝於宣政殿，對於麟德殿」，⁷⁴這應該就是遣唐使所說的「禮見」和「對見」，這些使者先是在皇帝不在場的宣政殿舉行禮見儀式，在麟德殿對見唐武宗。

在禮見和對見之間，直面皇帝的對見顯然更為重要。這是整個朝見禮儀流程的重心所在，其更強烈的儀式性表現力度自然不必多說，而且是賓主雙方進行實質性溝通的主要場合。上文提到的 777 年、804 年日本遣唐使在對見皇帝的禮儀上「所請並允」，就是證明。開成三年（838），圓仁隨遣唐使來到了中國，雖然留在揚州，但是他後來聽大使說，使團到達長安後，「即奏請益僧往台州」、「雇九個船且令修」等事，負責接待的禮賓使對他們說：「未對見之前，諸事不得奏聞。」儘管遣唐使還是在對見以前就請益僧前往天台山的事情提出了奏請，⁷⁵但是對見纔能奏聞在制度上應該是成立的。

以上這些現象都說明，與唐前期相比，唐後期的蕃使朝見場所在整體上向內轉移了，儘管還保留了正衙禮見的形式。這一變化與中晚唐皇帝政治空間的內移有很大關係。中國古代的朝會有三個層次：正至大朝會、朔望朝參和常朝。正旦大朝會、冬至大朝會和朔望朝參都有很强的儀式性，極少涉及實際政務，每天或每隔幾天舉

⁷² 藤原緒嗣（日），《日本後紀》（東京：吉川弘文館，1961），卷 12，延曆二十四年六月乙巳條，頁 42。

⁷³ 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國》，頁 107-113。後來，廣瀨憲雄對此也有申說，參見氏著，《東アジアの國際秩序と古代日本》，頁 238-243。

⁷⁴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976，〈外臣部·褒異三〉，頁 11299。

⁷⁵ 圓仁（日）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 1，開成四年二月廿四日條，頁 119-120。

行的常朝則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在大明宮中，正衙宣政殿曾經用作舉行常朝的場所，從玄宗朝開始，皇帝出席宣政殿常朝的次數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是在紫宸殿接見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安史之亂後，「宣政不復御正衙」，逐漸形成了在紫宸殿「隻日常朝」的制度。⁷⁶爲了在紫宸殿舉行「隻日常朝」，上朝官員需要通過宣政殿兩側的東、西上閣門，因此這一常朝又叫作「入閣」。

比起紫宸殿，延英殿在晚唐的政治生活中更加重要。延英議政的參加者以皇帝和宰相爲主，具有保密性高、形式靈活、討論內容沒有限制等特點，因而成爲唐後期御前會議最重要的形式。⁷⁷紫宸殿的「隻日常朝」隨之愈發形式化、空洞化。韓皋的例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他在德宗朝任御史中丞、京兆尹時，「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有人問他：「自乾元已來，群臣啓事皆詣延英得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乃失於慎密乎？」韓皋回答：「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植柔，惟在於公，何故不當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⁷⁸別人之所以對韓皋在紫宸殿奏事有質疑，是因為紫宸殿在國家日常政治中已經有些無足輕重了。延英奏對壓倒紫宸殿常朝，成爲晚唐政治決策的首要方式，這意味著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範圍顯著縮小，百官被排除在外，皇帝在朝廷政治中變得更爲強勢。⁷⁹

⁷⁶ 葉夢得（宋），《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2，頁 19-20。唐後期，朝廷內有人反對皇帝不御正衙的現象。例如，元稹在元和元年（806）向即位不久的憲宗上奏十事，其中「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見元稹（唐），《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32，〈獻事表〉，頁 373。他還向憲宗上奏，陳述皇帝不御正衙對諫官職責的不利影響：「近年已來，正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見元稹（唐），《元稹集》，卷 33，〈論諫職表〉，頁 378。但是，這些意見並沒有改變晚唐皇帝不御正衙的做法。吉田歡認爲，德宗、憲宗曾經恢復過宣政殿常朝的制度。松本保宣對這一看法進行了批駁，堅持唐後期一直實行紫宸殿常朝的觀點。參見吉田歡，《日中宮城的比較研究》，頁 106-113；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會議——唐代聽政制度の展開》，頁 248-282。

⁷⁷ 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60-72；袁剛，《隋唐中樞體制的發展演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165-180；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會議——唐代聽政制度の展開》，頁 21-69。

⁷⁸ 王讜（宋）著，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方正〉，頁 195-196。

⁷⁹ 在渡邊信一郎、辻正博對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中，都有將皇帝朝政空間的內移看作皇權削弱的傾

在晚唐，延英殿和麟德殿先後成為蕃使朝見皇帝的主要場所，與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後置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前朝的禮儀功能也未喪失殆盡。正如前文所說，儘管唐後期皇帝只是在紫宸殿出席「隻日常朝」，但是百官每天都要在皇帝不在場的宣政殿前立班朝參。與此對應，在延英殿、麟德殿先後用來舉行蕃使朝見禮儀的同時，正衙朝見的形式也沒有完全被廢棄，朝廷部分地保留了正衙的對外交往職能，皇帝則不出席在正衙舉行的禮見儀式。於是，形成了正衙禮見、後殿對見的形式。

另須留意的是，唐後期蕃使朝見的場所幾乎是沒有差異的，只有肅宗、代宗統治時期的回鶻使者有過一些例外，他們經常在右銀臺門朝見唐朝皇帝。右銀臺門處在大明宮西牆的偏南部，在唐後期充當出入禁廷的門戶，進行過奉表陳謝與陳乞、別狀進奉、引見使節、貢獻、進名起居、詣闕告狀等活動。⁸⁰晚唐長期給予幫助鎮壓安史叛軍有功的回鶻特殊禮遇。肅宗和穆宗分別將女兒寧國公主、妹妹太和公主嫁給回鶻可汗。肅宗還下詔重賞回鶻太子葉護：「才為萬人之敵，位列諸蕃之長。……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最高。可司空、仍封忠義王。」⁸¹這是將回鶻置於眾蕃之首的位置。右銀臺門比延英殿更加靠近內宮，肅宗、代宗多次在這裡接見回鶻使者，可能是給他們與眾不同的待遇。不過，從德宗朝開始，回鶻使者與其他蕃使一樣，都是在麟德殿對見唐朝皇帝。

《開元禮》中的賓禮是以單個周邊政權的君主、使者來朝為對象制定的，針對

向。參見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頁 72-80；辻正博，〈魏晉南北朝時代の聽訟と録囚〉，《法制史研究》，第 55 號（東京：法制史研究會，2006.3），頁 24-25。松本保宣對此表示疑慮，並提出了重視「隨著宮城諸殿宇的職能分化形成的制度發達」之視角的必要性，參見氏著，〈從朝堂到宮門——唐代直訴方式之變遷〉，收入鄧小南、曹家齊、平田茂樹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241、260。我贊同他的這一意見。政治空間的內移固然需要從政治權力分配的角度入手進行分析，但是不一定由皇權弱化致使，就中晚唐的情形而言，既有皇帝縮小議政範圍的考量，有時又被跋扈的宦官利用以擴張其權勢，具體情況非常複雜，這一問題值得繼續深入檢討。

⁸⁰ 王靜，〈唐大明宮內侍省及內使諸司的位置與宦官專權〉，《燕京學報》，新 16 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5），頁 103-105。

⁸¹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 195，〈回紇傳〉，頁 5200。

多個周邊政權的君主一同朝見唐朝皇帝的可能，《開元禮》有補充規定：「若更有諸蕃，以國大小爲叙。」⁸²多個周邊政權的使者來朝時，應該也是按照這一原則來安排順次。在晚唐，不同周邊政權的使者一起朝見皇帝是常有的事情，⁸³這時就會出現順位先後的問題。有關朝見禮儀中蕃使順位的記載很少，《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有一條記載，開成四年（839）日本遣唐使朝見文宗時，「會集諸蕃總五國，南照國第一立，日本國第二。自餘皆王子」。⁸⁴在類似情況下，有時難免有爭議出現，乾元元年（758）的爭長事件就是如此。《舊唐書·回紇傳》：「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回紇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長閣之等六人並朝見，至閣門爭長，通事舍人乃分爲左右，從東西門並入。」⁸⁵此事在《舊唐書·肅宗紀》也有記載：「五月壬申朔，回紇、黑衣大食各遣使朝貢，至閣門爭長，詔其使各從左右門入。」⁸⁶「閣門」就是宣政殿兩旁的東、西上閣門，回紇和黑衣大食的使者本來應該按照國力強弱，先後通過其中一個閣門，⁸⁷結果因爲兩國使者對順位發生爭執而改爲東、西上閣門並入。總體而言，無論是從《開元禮》中的賓禮制度來看，還是就晚唐的賓禮實踐而言，除了肅宗、代宗時期的回紇外，各周邊政權使者朝見唐朝皇帝的禮儀空間是一致的。

我們再看唐後期蕃客宴會的禮儀場所。從表 2 可以看到，與朝見場所相比，明

⁸²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卷 79，〈蕃主奉見〉，頁 387。

⁸³ 例如，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新羅、渤海、南詔、牂牁、昆明等使在麟德殿朝見穆宗；大和八年（834）正月，南詔、室韋、奚、契丹、牂牁等使在麟德殿朝見文宗；開成三年（838）二月，南詔、牂牁、契丹、奚、室韋、渤海等使在麟德殿朝見文宗。見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976，〈外臣部·褒異三〉，頁 11297、11298。

⁸⁴ 圓仁（日）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卷 1，開成四年二月廿七日條，頁 123。

⁸⁵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 195，〈回紇傳〉，頁 5200。

⁸⁶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卷 10，〈肅宗紀〉，頁 252。

⁸⁷ 天祐二年（905）四月，哀帝下敕：「東上閣門，西上閣門，比常出入，以東上爲先。大忌進名，即西上閣門爲便。比因閹官擅權，乃以陰陽取位，不思南面，但啓西門。邇來相承，未議更改，詳其稱謂，似爽舊規。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閣門，永爲定制。付所司。」見劉昫（唐）等，《舊唐書》，卷 20 下，〈哀帝紀〉，頁 793。雖然此時已是朱溫脅迫唐廷遷都洛陽之後了，這條敕文或許可以說明，唐代一般是通過東上閣門出入內朝，只有遇到帝后喪葬時，纔從西上閣門出入。乾元元年（758）回鶻和黑衣大食從東、西上閣門並入，實乃權宜之計。

確的宴會場所的記載比較少，⁸⁸也不易從中捕捉變化的規律，這與《開元禮》的制度規定和唐前期的實際運作有一脈相承之處。

【表 2】 唐後期的蕃客宴會禮儀場所⁸⁹

時間	場所	對象	史料來源（卷/頁）
乾元元年（758）	紫宸殿	回紇使	《冊府元龜》976/11293
乾元元年（758）	紫宸殿	新羅使、歸仁國使	《冊府元龜》976/11293
乾元元年（758）	紫宸殿	回紇使	《冊府元龜》976/11293
乾元元年（758）	紫宸殿	回紇使	《冊府元龜》976/11293
乾元二年（759）	紫宸殿	回紇王子	《冊府元龜》976/11293-11294
乾元二年（759）	麟德殿	柘羯使	《冊府元龜》976/11294
寶應元年（762）	麟德殿	奚、契丹使	《冊府元龜》976/11294
寶應元年（762）	延英殿	回紇使	《冊府元龜》976/11294
寶應二年（763）	紫宸殿	回紇使	《冊府元龜》976/11294
大曆二年（767）	紫宸殿	回紇、新羅使	《冊府元龜》976/11294
大曆四年（769）	紫宸殿	吐蕃使	《冊府元龜》976/11294
大曆六年（771）	麟德殿	文單國王	《冊府元龜》976/11294
貞元四年（788）	麟德殿	東蠻鬼王	《冊府元龜》976/11295
元和八年（813）	麟德殿	回紇使	《冊府元龜》976/11296

⁸⁸ 在唐後期蕃客來朝的記載中，有很多類似於「御麟德殿，對南詔使李興禮等，各授以官，宴賜有差」、「御麟德殿引見室韋大首領督熱論一十五人，宴賜有差」的記載（王欽若〔宋〕，《冊府元龜》，卷 976，〈外臣部·褒異三〉，頁 11296、11299），這讓人無法斷定宴會禮儀是不是在麟德殿舉行。

⁸⁹ 除了表二列舉的這些例子外，還有大曆二年（767）三月「宴吐蕃使於禮賓院」（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110，〈帝王部·宴饗二〉，頁 1200；卷 976，〈外臣部·褒異三〉，頁 11294）、長慶二年（822）九月「宴吐蕃使論悉諾等十五人於中書省」（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111，〈帝王部·宴饗三〉，頁 1205；卷 976，〈外臣部·褒異三〉，頁 11297）的記載。從史料記載來看，這兩次宴會禮儀似乎是皇帝親自為蕃使舉行的，只是地點在禮賓院、中書省，這看起來頗為奇怪，由於沒有其他的史料可以提供進一步的信息，我們無從得知其中的原因。另外，這兩次宴會禮儀會不會是皇帝委派臣下代為宴請蕃使，這一可能性也不好完全排除。

肆、五代賓禮的禮儀空間

五代時期迎勞授館、戒見日禮儀的史料闕如，我們只能探討蕃客朝見、宴會的禮儀空間。先看五代時期中原王朝的皇帝招待蕃主、蕃使的宴會禮儀，這方面的記載很少：天福三年（938）八月，後晉高祖「宴契丹冊禮使於廣政殿」；⁹⁰天福七年二月，「契丹遣使來聘。己丑，宴於武德殿，新恒州節度使杜重威已下、諸軍副兵馬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⁹¹同年八月，後晉少帝「宣喚契丹王母使舍利共一十二人宴於崇德殿」。⁹²後晉以開封為都城，廣政殿在五代後期經常用來舉行君臣宴飲，⁹³在北宋經過幾次改名後，於明道元年（1032）改名為集英殿，在垂拱殿、紫宸殿的西北方，「每春秋、誕聖節，錫宴此殿，熙寧以後，親策進士於此殿」。⁹⁴前面引文中的武德殿和崇德殿都在鄴都宮城內，天福六年八月，後晉高祖前往鄴都，次年六月在那裡去世，⁹⁵少帝即位於鄴都，天福八年二月返回開封。⁹⁶為蕃主、蕃使舉行宴會禮儀的記載少，不能排除有史料缺載的因素，但是也不無可能是因為實際舉行過的次數確實少，再加上史書撰寫過程中的篩選，致使我們只能找到這三條史料，而且三次宴會的宴請對象都是契丹使節。下文會指出，北宋不存在皇帝專門為契丹以外的蕃使舉行宴會的制度，這方面的實例也是極少，這一現象很有可能始於五代。

在五代，史料更多、也更值得關注的是朝見禮儀。此時，有了將大蕃、小蕃在朝見禮儀中的差別進一步顯現的觀念，這主要體現在朝見場所上。後唐天成元年（926）六月，朝廷內就蕃使朝見禮儀的場所進行了討論。御史臺認為，蕃使在內殿朝見皇帝，不足以展現出中原王朝的威儀，於是請求明宗下令中書門下商討。明

⁹⁰ 薛居正（宋）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77，〈後晉高祖紀三〉，頁 1017-1018。

⁹¹ 薛居正（宋）等，《舊五代史》，卷 80，〈後晉高祖紀六〉，頁 1057。

⁹²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980，〈外臣部·通好〉，頁 11354。

⁹³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111，〈帝王部·宴享三〉，頁 1209-1212。

⁹⁴ 徐松（清），《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方域 1 之 5，頁 7321。

⁹⁵ 薛居正（宋）等，《舊五代史》，卷 80，〈後晉高祖紀六〉，頁 1052、1062。

⁹⁶ 薛居正（宋）等，《舊五代史》，卷 81，〈後晉少帝紀一〉，頁 1068、1075。

宗將此事交給太常禮院檢討，太常禮院在奏文中說：「從開元定禮之後，本朝故事對諸番客，又並於內殿引對，其殿名曰參殿，事在禮賓使、客省使，不下外諸司，見今施行不一。近制唯回鶻番使則正殿引對。況回鶻見居甘州，其地元屬河西道涼州所管，每遣使進表幣，待以賓禮。皇帝御正殿，列百辟，鋪陳盛儀，酌禮沿情，事恐太重。伏請今後准諸番客例，祇於內殿引對，不臨正朝，兼免乖越，又符故事。」對此，明宗下敕：「正衙威容，未可全廢，內殿恩澤，且宜常行。若遇大番入朝，即准舊儀，於正殿排比，鋪陳立仗，百官排班，於正門引入對見。」⁹⁷太常禮院奏議中的「參殿」是「叁（三）殿」的異寫，也就是麟德殿。太常禮院的奏議提到，甘州回鶻的使者在正殿朝見後唐皇帝，其他蕃使在內殿進行朝見禮儀。明宗在敕文中更是明確指出，大蕃使臣應當引對於正殿，其他蕃使則朝見於內殿。如果結合五代時期蕃使朝見禮儀場所的記載，我們發現，太常禮院的奏議與事實有一定距離，明宗的敕文更多的是反映了一種觀念。

【表 3】 五代時期的蕃客朝見禮儀場所

時間	場所	對象	史料來源（卷/頁）
乾化元年（911）	朝元殿	回鶻、吐蕃使	《冊府元龜》972/11253
同光二年（924）	文明殿	回鶻使	《五代會要》28/448
天成元年（926）	文明殿	山後兩林百蠻使	《五代會要》30/478
天成二年（927）	中興殿	新羅國康州使	《五代會要》30/476
天成三年（928）	崇元殿	回鶻使	《五代會要》28/449
長興元年（930）	文明殿	東丹國國王	《五代會要》29/458
長興三年（932）	端明殿	吐蕃使	《五代會要》30/468
長興四年（933）	廣壽殿	回鶻使	《五代會要》28/449

從我們蒐集的史料看，在五代，只有後梁和後唐的幾次朝見禮儀明確記錄了舉

⁹⁷ 王溥（宋），《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30，〈雜錄〉，頁 480-481。此事在薛居正（宋）等，《舊五代史》，卷 36，〈後唐明宗紀二〉，頁 499-500 也有記載，只是較為簡略，但是我們由此知道御史臺的意見是御史大夫李琪領銜上奏的。

行地點，後晉、後漢和後周的朝見禮儀場所缺乏記載。由表 3 可以看到，用於蕃使朝見皇帝的宮殿有朝元殿、文明殿、崇元殿、中興殿、端明殿和廣壽殿。崇元殿在汴州，其他宮殿都在都城洛陽。天成二年（927）十月至四年二月，明宗駐蹕汴州，⁹⁸所以，天成三年（928）二月回鶻使的朝見禮儀在汴州的崇元殿舉行。

在唐代，東都宮城的正殿是含元殿，正衙是貞觀殿。後梁和後唐的洛陽宮城是繼承唐朝東都的宮城而來。含元殿在開平三年（909）改名為朝元殿，同光二年（924）改名為明堂殿，主要用來舉行正旦大朝會。貞觀殿在開平三年改名為文明殿，除了冬至和五月朔的大朝會禮儀外，還是舉行百官常參的地方。⁹⁹由表 3 可以看到，在後唐，文明殿用來舉行蕃使朝見禮儀的次數最多。這與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前移有很大關係。

後唐初年，「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¹⁰⁰雖然有文明殿常朝，卻形同虛設，皇帝並不出席，只在內廷與重臣商討國家大事。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天成元年五月，明宗下敕建立在中興殿舉行的內殿起居制度：「今後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¹⁰¹對於內殿起居制度，李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¹⁰²朔望入閣的制度始於唐玄宗統治時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盤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閣門，遂有『入閣』之名。」¹⁰³晚唐的皇帝「隻日常朝」時，「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為盛禮，亦謂之『入閣』」。¹⁰⁴到了唐末，朔望入閣被廢止。李琪不贊成五日一次在內殿起居的做法，要求改用朔望入閣的舊制。明宗對此作了答覆：「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

⁹⁸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108，〈帝王部·朝會二〉，頁 1177。

⁹⁹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108，〈帝王部·朝會二〉，頁 1175-1182。

¹⁰⁰ 歐陽修（宋），《新五代史》，卷 54，〈李琪傳〉，頁 617。

¹⁰¹ 王溥（宋），《五代會要》，卷 5，〈朔望朝參〉，頁 86。

¹⁰² 歐陽修（宋），《新五代史》，卷 54，〈李琪傳〉，頁 618。

¹⁰³ 宋敏求（宋），《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中，頁 27。

¹⁰⁴ 葉夢得（宋），《石林燕語》，卷 2，頁 19。

而朔望入閣可復。」¹⁰⁵朔望入閣制度由此重建，地點就在文明殿。雖然在正衙文明殿舉行朔望入閣的做法有違唐代入閣的本意，也遭到了後人譏諷，¹⁰⁶但是皇帝的日常政治空間因此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前移。

文明殿朔望入閣的制度建立後，李琪依然關注朝會制度的實行。天成元年七月，御史臺在奏文中指出：「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閣，所司排儀仗，金吾勘契入後，有待制次對官，各舉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言動，以付史館編修帝錄，此本朝經久之制也。」可是，在現實中，朔望入閣和五日一次的內殿起居形式大於內容，君臣無法就國家大事暢所欲言，「序班而入，拜手而回；縱有公事要言，亦且卷行須出；百司何由舉職，兩史無以記言」。於是御史臺請求皇帝「每月一日、十五日，兩度出御文明殿，排入閣之儀，諸司依前轉對奏論本司公事」，「如陛下切於群臣有所敷陳，即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班行內有要奏事者，臨門狀到，便許引入此」。¹⁰⁷實際上，這份奏文也是御史大夫李琪所上，¹⁰⁸並且得到了明宗的認可。通過以上這些舉措，皇帝與臣僚之間溝通的渠道擴大了，更多的官員得以向皇帝奏事，參與朝廷政務的討論。

前面說過，李琪代表御史臺上奏反對在內殿舉行蕃使朝見禮儀，發生在天成元年六月，時間正好處在他兩次奏請改革朝會制度期間。而且，李琪在奏請中指出，入閣班退後皇帝在內殿引對朝貢蕃客的做法「頗失常儀」，應當在正殿「列其百辟，示彼四夷，俾觀多士之羽儀，以顯九重之嚴重」。¹⁰⁹很顯然，李琪對蕃使朝見禮儀的批評，與他對朝會制度的關注密切相關。蕃使的朝見禮儀常在正衙舉行，主要是與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前移有密切關係。

與晚唐相似，五代仍有一部分內朝宮殿用於蕃使朝見儀式，中興殿、端明殿和

¹⁰⁵ 歐陽修（宋），《新五代史》，卷 54，〈李琪傳〉，頁 618。

¹⁰⁶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125，寶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條，頁 2946。

¹⁰⁷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卷 517，〈憲官部·振舉二〉，頁 5866。

¹⁰⁸ 李琪，〈請更定朔望入閣奏對疏〉，收董誥（清）等，《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847，頁 8900-8901。

¹⁰⁹ 王溥（宋），《五代會要》，卷 30，〈雜錄〉，頁 480。

廣壽殿都位於內朝。我們注意到，天成元年六月後，蕃使朝見禮儀場所的選擇也沒有像明宗敕文那樣完全體現出大蕃、小蕃的差別，西南的山後兩林百蠻使在文明殿朝見了後唐明宗，回鶻使的朝見禮儀也在廣壽殿舉行過。根據大蕃、小蕃來安排朝見的禮儀空間，在此時恐怕還是更多地停留在觀念上，到了宋代開始比較有規律地實行。

伍、北宋初期賓禮的禮儀空間

爲了理解北宋的賓禮空間，有必要先對北宋的宮城進行一番分析。北宋的宮城最初是唐朝宣武軍節度使的治所，後梁時稱爲建昌宮，後唐重新變爲宣武軍節度使的治所，後晉時稱爲大寧宮。建隆三年（962）五月，宋太祖「命有司案西京宮室圖修宮城」，次年五月「詔重修大內」。¹¹⁰從空間結構來看，北宋大內分爲三部分，首先是連接東華門和西華門的橫街將宮城分爲外朝和內朝，內朝部分又被連接宣祐門和拱辰門的縱街分爲東、西兩部分，東邊主要是內朝的服務機構，西邊是內朝宮殿區。這與唐朝宮城的主要建築位於南北中軸線的特點很不一樣。外朝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宮殿。一是正殿大慶殿，在宮城的正南門宣德門之北。大慶殿在北宋曾經被稱爲崇元殿、乾元殿、朝元殿、天安殿，「正至朝會、冊尊號，御此殿。饗明堂、恭謝天地，即此殿行禮。郊祀，齋宿殿之後閣」。二是正衙文德殿，位於大慶殿以西，在北宋曾稱文明殿，「太祖時元朔亦御此殿，其後常陳入閣儀。如大慶殿饗明堂、恭謝天地，即齋於殿之後閣。熙寧以後月朔視朝，御此殿」。此外，文德殿還用於常參，常參又名常起居，是不厘要務的朝臣在外朝文德殿上朝，由一名宰臣押班，皇帝則不出席。內朝的幾個重要宮殿有前殿、後殿之分，紫宸殿、垂拱殿是前殿，崇政殿、延和殿是後殿。紫宸殿曾被稱爲崇德殿，「即視朝之前殿，每誕節稱

¹¹⁰ 徐松（清），《宋會要輯稿》，方域 1 之 11，頁 7324。

和蕃使爲對象，分別制定儀式。《宋史·禮志》在介紹《開寶通禮》中的賓禮時，提到了蕃主來朝禮儀中的遣使迎勞就館、遣使戒見日、蕃主在乾元殿朝見宋朝皇帝、皇帝賜宴，對前三項儀式有詳細的記載，這三項儀式的內容與《開元禮》基本一致。¹¹²朝辭禮儀沒有被提及，參照唐朝的制度，《開寶通禮》的賓禮中應該不至於沒有朝辭禮儀，很可能是由於內容與朝見禮儀大致相同而從略。《宋史·禮志》在說到《開寶通禮》中的蕃使來朝禮儀時，只用了「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通禮》」的簡短表述。¹¹³《開元禮》中的「受蕃國使表及幣」包括迎勞授館、戒見日和朝見禮儀，《開寶通禮》中的「受諸國使表及幣」想必也是如此。從這條史料來看，我們無法確定《開寶通禮》中是否有賜予蕃使的宴會禮儀。

蕃主來朝在宋代極其罕見，開寶九年（976）、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王錢俶兩次來到開封，分別朝見宋太祖和宋太宗，是爲數不多的實例。對宋朝來說，錢俶的身分是蕃主。此時，吳越的形勢已經岌岌可危，在朝見宋太宗之後僅兩個月，走投無路的錢俶就向宋朝輸誠了。¹¹⁴開寶九年錢俶來朝時，「宋帝詔皇子德昭迎勞。翼日，王至京師，賜宴於迎春苑。尋詔王居禮賢宅。王未至前，宋帝幸其宅，躬自閱視，異數也。戊午，王朝見於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及寶玉金器五千餘事、上酒一千瓶，遂賜宴長春殿」。¹¹⁵太平興國三年，錢俶再次來朝，「朝見宋帝於崇德殿，宋帝命親王迎接，賜宴於長春殿，令恩赦侯銀、違命侯煜陪坐」。¹¹⁶前文說過，《開寶通禮》中的蕃主來朝禮儀應該包括迎勞授館、戒見日、朝見、宴會、朝辭五部分。我們只知道錢俶前一次來朝時住在禮賢宅，無從瞭解他後一次來朝的住所。既然住在禮賢宅，那麼前一次來朝時迎勞授館、戒見日儀式應該都是在此地舉行。禮賢宅在京城南部，本來是宋太祖爲南唐國主李煜來朝所作，「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錢俶來朝時被

¹¹² 脫脫（元）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119，〈禮志二十二〉，頁 2804。

¹¹³ 脫脫（元）等，《宋史》，卷 119，〈禮志二十二〉，頁 2804。

¹¹⁴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9，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乙酉條，頁 427。

¹¹⁵ 吳任臣（清），《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82，〈吳越忠懿王世家下〉，頁 1171。

¹¹⁶ 吳任臣（清），《十國春秋》，卷 82，〈吳越忠懿王世家下〉，頁 1175。

安排居住於此處。¹¹⁷錢俶兩次來朝，都是在崇德殿朝見宋朝皇帝，朝會禮儀之後的正式宴會在長春殿舉行，朝辭地點不詳。在《開寶通禮》中，蕃主朝見的場所為宮城正殿乾元殿（大慶殿），宴會禮儀的地點則無從獲知。錢俶朝見宋太祖、宋太宗的禮儀卻是在內朝前殿崇德殿舉行，這裡也許有宋朝看輕已經危在旦夕的吳越國的因素。不過，在整個北宋，外朝的正殿、正衙確實沒有充當過蕃主或蕃使見辭、宴會的場所，這與北宋皇帝的日常政治空間在內朝有關。¹¹⁸

整個北宋，除了錢俶，我們很少能夠看到有其他周邊政權的君主以蕃主身分來朝。《政和五禮新儀》中依然有蕃主入朝禮儀，分為遣使迎勞、遣使戒見日、陳設、朝見、會蕃國主。其中，「陳設」、「朝見」與《開元禮》中的「蕃王奉見」等同，「會蕃國主」就是宴會禮儀。此外，應該還有未被提到的朝辭禮儀。所以《政和五禮新儀》中蕃主來朝禮儀的構成、儀式進程與《開元禮》、《開寶通禮》基本一致。但是，這些禮儀有名無實，沒有在現實中得到實施。

前文提到，受史料記載的限制，我們不清楚《開寶通禮》中是否有皇帝宴蕃使的禮儀。不過，從實際運作來看，宋朝皇帝一般不為蕃使專門設宴，只是安排他們「預宴」，¹¹⁹也就是讓他們出席以其他名義召集的宴會，只有契丹例外。雖然《宋史·禮志》說「宋朝之制，凡外國使至，及其君長來朝，皆宴於內殿，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皆預。……是後，宴外國使為常」，¹²⁰但是這一說法的準確性相

¹¹⁷ 葉夢得（宋），《石林燕語》，卷1，頁1。

¹¹⁸ 平田茂樹的研究表明，平時北宋皇帝的政治活動主要在內朝展開，即便是議政人數較多的前殿（垂拱殿）視朝，也只有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元豐官制改革後是三省、樞密院、尚書六曹、開封府）的長官、次官參與。參見平田茂樹著，林松濤、朱剛等譯，《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93-295。在他看來，在政治決策的過程中，皇帝和官僚是兩個主體，他們通過文書交往和人際交往而形成政治意向，作為政治空間的「場」是由官僚形成意見的「場」和皇帝裁決的「場」構成的。他利用渡邊信一郎和松本保宣的研究成果指出，從唐後期開始，「皇帝決策的『場』作為直接聯絡皇帝和官僚的系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決策過程轉移到以皇帝為中心的空間」（平田茂樹著，林松濤、朱剛等譯，《宋代政治結構研究》，頁9-10）。這些看法頗具啟發性。北宋皇帝的日常政治空間與唐後期有相似之處，皇帝和官僚之間距離較遠，能夠參與前殿視朝的官員人數不多，大多數朝臣只能在外朝文德殿上朝，皇帝不出席文德殿常參，由一名宰臣押班。政治空間的變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皇帝之政治角色的重要視角。

¹¹⁹ 脫脫（元）等，《宋史》，卷113，〈禮志十六〉，頁2688。

¹²⁰ 脫脫（元）等，《宋史》，卷119，〈禮志二十二〉，頁2803。

當可疑。湯勤福、王志躍已經指出，省略號之前的文字出自《宋會要》，「《輯稿》所載爲宴大遼使、副，而《宋史》則用爲推廣至所有外國使節，不知何據」；省略號之後的文字「爲修史者概括之語」。¹²¹我同意這一看法。上引《宋史·禮志》中被省略的部分記載了宋朝建立後至太平興國年間有蕃客參與的宴會，對象有被宋朝吞併前的南方諸國國主、契丹使、高麗使和諸國蕃客，但是高麗使、諸國蕃客參加的宴會皆非爲他們專設，相反宋朝有在開寶八年（975）、太平興國二年（977）賜宴於契丹使的事例。¹²²可見，在宋初的賓禮實踐中，已經出現契丹使者優於其他蕃使的現象。

澶淵之盟前，契丹與宋朝之間就已經多次互派使者，其中，開寶八年契丹派克妙骨慎思奉書來聘，是契丹第一次遣使來宋。爲了迎接契丹使節，太祖「詔東上閣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三月二十六日「召見崇德殿，賜襲衣、金帶、銷金、皂羅帽、烏皮靴、器幣二百、銀鞍、勒馬，其從者十二人衣服、器幣有差」，二十九日「詔契丹使於講武殿觀諸殿騎士習射，令其二從者裊屋六、條首里與衛士馳射、毛球、截柳枝」，三十日「又宴於長春殿」，¹²³「及辭歸國，復召見，賜器幣」。¹²⁴在上述活動中，只有講武殿觀騎射不屬於賓禮的範疇。爲契丹使者舉行迎勞授館儀式的地點在都亭驛，按照常理推斷，戒見日儀式也應在此處舉行。朝見和宴會禮儀分別在崇德殿和長春殿舉行，朝辭地點在史料中沒有提及。儘管記載相當簡略，通過宋朝對此次契丹使者所作的安排，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澶淵之盟後宋朝制定的契丹國信使副朝見、宴會禮儀的雛形。作爲宋朝周邊最強大的政權，契丹的使節得到了宋朝特別的禮遇。隨著日後宋朝對遼戰爭的失敗，在宋代賓禮中，契丹使節與其他蕃使的落差變得更加懸殊。

¹²¹ 湯勤福、王志躍，《宋史禮志辨證》（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頁839、842。

¹²² 徐松（清），《宋會要輯稿》，蕃夷1之2，頁7673；蕃夷1之4，頁7674。

¹²³ 徐松（清），《宋會要輯稿》，蕃夷1之2，頁7673。

¹²⁴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6，開寶八年三月己亥條，頁337。

陸、澶淵之盟後蕃使來朝的禮儀空間

在北宋對外關係史上，景德元年（1004）的澶淵之盟最具轉折意義。宋朝建立後，一度對外推行強硬政策，南方和北漢都被征服而進入宋朝版圖。但是，雍熙北伐失敗後，東北各族陸續斷絕了與宋朝的朝貢關係，被契丹重新控制。¹²⁵從此，北宋一改積極進取的戰略，轉而採取守勢。澶淵之盟後，宋、遼更是形成了對等外交關係。¹²⁶在這種形勢下，建構一個以宋朝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不可能，因此北宋面對的國際環境格外複雜，他們制定了不同的策略來應對不同的周邊政權，這在蕃使來朝禮儀上有突出表現。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朝制定了〈高麗國使副見辭〉、〈交州使副見辭〉和〈宜州西南蕃黎州等處蠻王子見辭〉，次年制定了〈海外進奉蕃客見辭〉。¹²⁷九年，又制定了〈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朝見宴〉和〈契丹國信使副辭〉。¹²⁸此時西夏的地位尚介於藩鎮與周邊政權之間，所以沒有為他們制定見辭儀注。可見，從真宗朝開始，北宋在禮制上對來朝蕃使進行區分對待。在此之後，這一原則一直得到了貫徹。在政和三年（1113）頒布的《政和五禮新儀》中，周邊政權來朝的禮儀也是根據這樣的原則編纂的，除了〈蕃國主來朝儀〉，還有〈紫宸殿大遼使朝見儀〉、〈紫宸殿正旦宴大遼使儀〉、〈紫宸殿大遼使朝辭儀〉、〈崇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見儀〉、〈崇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辭儀〉、〈夏國進奉使見辭儀〉、〈高麗國進奉使見辭儀〉、〈交州進奉使見辭儀〉、〈宜州西南蕃黎州等處進奉使人見辭儀〉、〈海外進奉蕃客見辭儀〉。在蕃主來朝禮儀之外，蕃使來朝禮儀按國別制定，除了遼、西夏、高麗、交州、宜州、西南蕃、黎州，其他蕃使的來朝禮儀以〈海外進奉蕃客見辭儀〉實行。¹²⁹

¹²⁵ 黃純豔，〈雍熙戰爭與東北亞政治格局的演變〉，《史林》，2010年第6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10.12），頁57-59。

¹²⁶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15-42。

¹²⁷ 歐陽修（宋）等，《太常因革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821冊，卷84，頁583-584。

¹²⁸ 歐陽修（宋）等，《太常因革禮》，卷83，頁580-582。

¹²⁹ 在《政和五禮新儀》中，賓禮除了這些蕃主、蕃使來朝禮儀，還有各種主要面向國內臣僚的朝會禮儀，

大中祥符年間頒布的賓禮儀注以見辭禮儀為主，並未涉及迎勞授館、戒見日的內容，這恐怕是因為迎勞授館、戒見日禮儀仍然延續了《開寶通禮》的規定。即便如此，這兩項儀式的禮儀空間也出現了分化的現象。澶淵之盟後，北宋建立了國信所、都亭西驛、懷遠驛，重組了禮賓院，分別掌管對外交往事宜。國信所建於都亭驛，國信所負責外事管理，都亭驛提供食宿。都亭西驛、禮賓院和懷遠驛則是集外事管理、宿泊服務於一身。國信所和都亭驛面向契丹，都亭西驛面向以西夏為首的河西蕃部，懷遠驛面向回鶻、吐蕃、女真等國，懷遠驛面向交州、龜茲、大食、于闐等國。北宋後期還建立了同文館，負責館待高麗使節、處理宋麗交往事務。¹³⁰

不同周邊政權的使節在賓禮上的分化，不僅表現在迎勞授館、戒見日的禮儀空間上，在朝見、宴會、朝辭禮儀上更是有充分的反映。第一，契丹國信使的見辭禮儀是專門安排的，其他蕃使的見辭禮儀在國內官員的朝見、謝辭禮儀前後穿插進行。高麗使、交州使的朝見禮儀在國內官員的朝見班後、謝辭班前，朝辭禮儀在謝辭班後；宜州西南蕃黎州等處蠻王子和海外蕃客的朝見禮儀和朝辭禮儀，都在國內官員的謝辭班後。第二，宰臣、樞密使領銜的朝廷重臣參加契丹國信使的見辭禮儀，在其他蕃使見辭禮儀中，在場最主要的官員是通事舍人。在契丹國信使進入殿庭前，宰臣、樞密使以下的官員先向皇帝起居。契丹使向閣門使跪進書匣後，閣門使升殿進奏，內侍都知拆開國書後交給宰臣，由宰臣和樞密使進呈給皇帝。契丹國信使朝辭宋朝皇帝時，也有宰臣以下的官員參加這一禮儀。高麗使、交州使舉行見辭禮儀時，由通事舍人通進並且引導使副行禮；宜州西南蕃黎州等處蠻王子和海外蕃客舉行見辭禮儀時，通事舍人不通進，只是引導使副行禮。第三，在契丹國信使舉行見辭禮儀時，使團成員可以分批次升殿面見宋朝皇帝，其他蕃使只能立於殿庭中向皇帝行見辭之禮。呈交國書後，契丹國信使副升殿來到皇帝御座前，轉達契丹國主對

這與唐至北宋時期絕大多數時候的情況都不同，且只實行了十餘年。關於這一問題的探討，參見金子由紀，〈北宋の大朝會儀禮〉，《上智史學》，第47號（東京：上智大學史學會，2002.11），頁63-70。

¹³⁰ 朱溢，〈北宋外交機構的形成與演變——以官僚體制和周邊局勢的變動為線索〉，《史學月刊》，2013年第12期（開封：河南大學、河南省歷史學會，2013.12），頁35-39。

宋朝皇帝身體的問候。宋朝皇帝回問契丹使副其國主身體如何，契丹使副回奏後下殿。然後，契丹國信使、副使、舍利以下、通事以下分別升殿，向皇帝行起居禮。其他周邊政權遣使來朝時，使團內只有部分成員能夠進入殿庭，其他成員只能在殿庭門外行禮。第四，只有宋朝皇帝與契丹國信使有就雙方君主身體安康互致問候的環節，其他蕃使見辭宋朝皇帝時，儀式進程簡單很多。第五，只有契丹使節能得到賜宴的待遇，其他蕃使只是被賜予酒食。為契丹使節專設的宴會在長春殿舉行，有宰臣、親王、樞密使以下的官僚參加，契丹使副坐於殿上，舍利以下坐於兩廊。其他蕃使被賜予酒食的待遇遠遠不及契丹國信使。在《政和五禮新儀》中，契丹以外的使節依然只有見辭禮儀，沒有宴會禮儀。以上這些都顯示了契丹國信使與其他蕃使之間巨大的待遇鴻溝，不僅如此，高麗、交州與宜州西南蕃黎州等處蠻王子、海外蕃客之間也存在禮儀規格的落差。禮儀空間是反映禮儀落差的重要方面，這無論是在賓禮儀注中使者行禮位置的規定上，還是在後來賓禮實踐中宮殿的選擇上都有突出表現。

在澶淵之盟後來朝的蕃使中，遼使自然最受看重。宋遼之間頻繁派遣使節，有在正旦和皇帝、太后生辰等場合派遣的常規性使節，還有因為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去世、解決兩國糾紛等事件臨時派遣的使節。對此，聶崇岐和傅樂煥都進行過資料的整理。¹³¹在有關遼使來聘的史料中，禮儀場所的記載數量有限。大中祥符九年（1016）制定的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見辭儀注規定，宋朝皇帝在崇德殿接受遼使的朝見、朝辭。¹³²表 4 是排除了祭奠、弔慰之類與凶事有關的使節來宋的異常事例而編成的。通過有限的數據可以看到，契丹使者幾乎都是在崇德殿（紫宸殿）見辭宋朝皇帝，僅有的例外發生在熙寧七年（1074）三月，但是這純屬事出有因，正逢幾日前神宗「詔以旱避正殿，減常膳」，¹³³於是朝見、朝辭禮儀改至崇政殿舉行。

¹³¹ 聶崇岐，《宋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334-375；傅樂煥，《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79-232。

¹³² 歐陽修（宋）等，《太常因革禮》，卷 84，〈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朝見宴〉，頁 580；卷 84，〈契丹國信使副辭〉，頁 581。

¹³³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1，熙寧七年三月癸卯條，頁 6111。

北宋末年的《政和五禮新儀》規定，遼使見辭宋朝皇帝的場所是紫宸殿，如遇假日，見辭禮儀改在後殿崇政殿舉行，而且遼國使團依然能夠分批次升殿直面宋朝皇帝。

【表 4】澶淵之盟後遼使見辭北宋皇帝的禮儀場所

時間	地點	場合	史料來源（卷/頁）
景德二年（1005）	崇德殿	賀承天節	《長編》61/1374
慶曆二年（1042）	紫宸殿	議事	《會要》蕃夷 2 之 12/7698
慶曆二年（1042）	紫宸殿	議事	《會要》蕃夷 2 之 16/7700
慶曆五年（1045）	紫宸殿	獻物	《會要》蕃夷 2 之 16/7700
熙寧七年（1074）	崇政殿	議事	《長編》251/6121、6135
熙寧八年（1075）	紫宸殿	議事	《長編》261/6358
熙寧八年（1075）	紫宸殿	議事	《會要》蕃夷 2 之 24/7704
熙寧九年（1076）	紫宸殿	賀同天節	《會要》蕃夷 2 之 26/7705
熙寧九年（1076）	紫宸殿	回謝	《長編》277/6786
元豐五年（1082）	紫宸殿	賀正旦	《長編》331/7990
元豐八年（1085）	紫宸殿	賀登寶位	《長編》361/8648
元豐八年（1085）	紫宸殿	賀興龍節	《長編》362/8657
元豐八年（1085）	紫宸殿	賀正旦	《長編》363/8683
元祐二年（1087）	紫宸殿	賀坤成節	《長編》403/9805
元符二年（1099）	紫宸殿	泛使	《會要》蕃夷 2 之 30/7707

大中祥符九年頒布的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來朝儀注規定，宴會禮儀在長春殿（垂拱殿）舉行。¹³⁴不過，從實際運作來看，宴會禮儀並未全然固定在垂拱殿，

¹³⁴ 歐陽修（宋）等，《太常因革禮》，卷 84，〈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朝見宴〉，頁 581。

我們也能找到宋朝皇帝在紫宸殿或崇政殿賜宴遼使的記載。¹³⁵與朝見、朝辭禮儀相比，宴會的禮儀場所相對靈活，並不完全遵守制度的規定，這也是宴會禮儀一貫的特色。

大中祥符年間沒有規定高麗使朝見禮儀的場所。天禧元年（1017），「高麗遣使與女真首領來貢，對於崇政殿」。¹³⁶後來，高麗斷絕了與宋朝的封貢關係，熙寧四年（1071），兩國重新開始官方層面的往來。宋朝在制定高麗使節來朝禮儀時，閤門說：「高麗使入見，欲依夏國例，立班紫宸殿。」¹³⁷可見此時西夏使節多在紫宸殿朝見宋朝皇帝，北宋以此為參照來安排高麗使的朝見禮儀。此後，高麗使也是在紫宸殿或垂拱殿朝見皇帝。¹³⁸這與高麗在北宋統治者心目中地位的上升有關。北宋與高麗恢復來往後，意欲拉攏高麗與遼抗衡，¹³⁹於是高麗在北宋對外政策中的位置逐漸超過了西夏。例如，《神宗正史·職官志》在記載禮部主客司的職掌時說：「凡本司所治之所事，契丹國遣使朝賀，應接送館伴官，所用儀物，皆預令有司為之辦具。高麗亞契丹。其餘蕃國，則按其等差，以式給之。」¹⁴⁰此時，高麗在接待官員、所用儀物等方面已經僅次於遼。到了徽宗朝，高麗在不少方面獲得了與遼一樣的待遇。過去宋朝一般用尚書、學士充任遼使的館伴使，高於館伴高麗使節的中書舍人，到了大觀年間，改用學士館伴高麗使節。¹⁴¹政和年間，「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

¹³⁵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2，嘉祐元年正月戊午條，頁 4394；卷 275，熙寧九年五月戊午條，頁 6721。

¹³⁶ 王應麟（宋），《玉海》，卷 160，頁 2940。

¹³⁷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26，熙寧四年八月丙寅條，頁 5504。

¹³⁸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9，熙寧七年正月乙丑條，頁 6076；卷 302，元豐三年正月己丑條，頁 7349；卷 362，元豐八年十二月辛酉條，頁 8655；徐松（清），《宋會要輯稿》，蕃夷 4 之 104，頁 7765。

¹³⁹ 蘇轍對此有清楚的表述：「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見蘇轍（宋），《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46，〈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頁 1003。北宋後期，包括蘇轍在內的一批官僚反對聯麗抗遼的策略，參見楊渭生，《宋麗關係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頁 227-232。不過，這一戰略因為有皇帝及其重臣的支持而長期被貫徹執行。

¹⁴⁰ 徐松（清），《宋會要輯稿》，職官 13 之 46，頁 2687。

¹⁴¹ 葉夢得（宋），《石林燕語》，卷 7，頁 95。

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¹⁴²然而，高麗和遼在北宋外交中的位置終歸不同，宋、麗之間的關係並不對等。儘管北宋後期高麗的見辭禮儀也經常在紫宸殿或垂拱殿舉行，但是《政和五禮新儀》依然沒有明確規定高麗使節的見辭場所，而且高麗使節還是只能立於殿庭朝見、朝辭宋朝皇帝。

從前引熙寧四年閤門的奏文來看，西夏使節應該是常在紫宸殿朝見宋朝皇帝。與契丹相比，西夏給北宋帶來的戰爭麻煩更多。北宋在文化上輕視西夏，將之看作弱小的夷狄，但又能夠正視西夏的軍事力量。¹⁴³因此，北宋非常在意西夏的蕃臣身分，¹⁴⁴卻不得不重視與西夏的交往。不過，隨著高麗在北宋對外戰略中地位的上升，北宋對西夏的禮遇程度有所下降。這在朝見場所的安排上也有所反映：元祐元年（1086）五月，西夏賀登寶位使的朝見禮儀在延和殿舉行；¹⁴⁵七月，西夏遣使來宋商談邊疆事宜，見哲宗於延和殿；¹⁴⁶次年三月，西夏進奉使在延和殿朝見哲宗；¹⁴⁷元符二年（1099）九月，西夏遣使來宋朝謝罪，朝見哲宗於崇政殿。¹⁴⁸由表 4 可知，同樣是前來祝賀哲宗登極，遼使的朝見禮儀就在紫宸殿舉行。不過，儘管高麗地位上升的勢頭迅猛，但是其在北宋後期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並未全面壓倒西夏，最值得注意的是《政和五禮新儀》的規定：「凡蕃客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州，次海外蕃客，次山後諸蠻。」¹⁴⁹

最後，我們來看其他周邊政權使節朝見、朝辭的禮儀空間。大中祥符年間制定的〈宜州西南蕃黎州等處蠻王子見辭〉和〈海外進奉蕃客見辭〉規定，這些蕃使在

¹⁴² 脫脫（元）等，《宋史》，卷 487，〈高麗傳〉，頁 14049。

¹⁴³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260-273。

¹⁴⁴ 李華瑞指出，在北宋，無論是官方還是士人，都堅持不與西夏進行平等交往。例如，在國書格式上，北宋將對西夏的文書稱作賜詔，把西夏對宋的文書稱作奉表上書或貢函；接待西夏使臣時，北宋採用屬國陪臣之禮。參見氏著，《宋夏關係史》，頁 264-266。

¹⁴⁵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77，元祐元年五月庚申條，頁 9151。

¹⁴⁶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82，元祐元年七月癸亥條，頁 9310。

¹⁴⁷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6，元祐二年三月戊辰條，頁 9653。

¹⁴⁸ 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15，元符二年九月庚子條，頁 12234。

¹⁴⁹ 鄭居中（宋）等，《政和五禮新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647 冊，卷 155，〈夏國進奉使見辭儀〉，頁 694。

崇德殿的殿庭向宋朝皇帝行朝見、朝辭之禮，他們不能上殿。成尋在《參天台五臺山記》中提到了熙寧五年（1172）正在行用的海外進奉蕃客朝見禮儀的儀注：「應每有海外進奉蠻子蕃客等朝見，具筓子與朝見目，問奏進奉人姓名已下，著所賜衣及賜酒食後，依例於崇正殿報『無公事』前再拜出。引當殿，唱賜酒食。唱拜，再拜。隨拜，『萬歲』唱。各祇候酒食畢，唱拜，再拜。隨拜，『萬歲』唱，各祇候出。」¹⁵⁰這說明，後來經過調整，海外進奉蕃客的朝見禮儀改至崇政殿舉行。從表 5 可知，在北宋末年女真崛起以前，契丹、高麗、西夏之外的蕃使確實主要是在內朝後殿崇政殿、延和殿朝見宋朝皇帝。¹⁵¹《政和五禮新儀》沒有規定這些次要蕃國的使臣在哪個宮殿見辭宋朝皇帝，但是有一點很明確，他們都只能立於殿庭行禮。

【表 5】遼、麗、夏之外蕃使見辭北宋皇帝的禮儀場所

時間	場所	對象	史料來源（卷/頁）
景德元年（1004）	崇政殿	交趾使	《會要》蕃夷 4 之 26/7726
大中祥符六年（1013）	長春殿	龜茲使	《長編》81/1853
大中祥符七年（1014）	崇德殿	西南蕃使	《會要》蕃夷 5 之 19/7776

¹⁵⁰ 成尋（日），《參天台五臺山記》（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8），卷 4，熙寧五年十月廿一日條，頁 119。

¹⁵¹ 成尋的朝見、朝辭禮儀分別在延和殿、崇政殿舉行，見成尋（日），《參天台五臺山記》，卷 4，熙寧五年十月廿二日條，頁 120；卷 8，熙寧六年四月二日條，頁 271。學者們對宋朝以何種規格接待成尋有不同看法。藤善真澄、遠藤隆俊、曹家齊等人都認為，雖然宋朝明知成尋並非日本國使，但是還是將其當作正式使節來接待。參見藤善真澄，《參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頁 283-317；遠藤隆俊，〈文書中所見宋朝對日本使客之接待——以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為題材〉，收入鄧小南、曹家齊、平田茂樹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680-699；曹家齊，〈北宋熙寧內諸司及其行政秩序——以參與接待成尋的御藥院和客省為中心之考察〉，《北京大學學報》，2011 年第 2 期（北京：北京大學，2011.4），頁 131-140；曹家齊，〈宋朝對外國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參天台五臺山記》為中心之考察〉，《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11.8），頁 109-124。廣瀨憲雄從朝見禮儀的角度考察了宋朝對成尋身份的定位，得出了成尋並未被當作正式國使的結論，參見氏著，《東アジアの國際秩序と古代日本》，頁 278-292。我個人傾向於廣瀨憲雄的意見。另外，元豐六年（1083）日僧快宗又一次來宋時，也是在延和殿朝見宋神宗，見李燾（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34，元豐六年三月己卯條，頁 8031。這些在身分上嚴格地說不能算作國使的外來客人也是在內朝後殿舉行見辭儀式，這對本文探討的問題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大中祥符八年（1015）	承明殿	注輦使	《玉海》160/2944
大中祥符九年（1016）	崇政殿	大食使	《會要》蕃夷 4 之 91/7759
天聖八年（1030）	崇政殿	占城使	《會要》蕃夷 4 之 70/7748
熙寧二年（1069）	崇政殿	唃廝囉使	《會要》蕃夷 6 之 7/7822
熙寧六年（1073）	延和殿	唃廝囉使	《會要》蕃夷 6 之 9/7823
元豐六年（1083）	延和殿	于闐使	《長編》335/8061

柒、結語

根據唐宋賓禮的研究現狀和史料狀況，我們選擇了行禮地點的記載為突破口，將其擴展為禮儀空間的討論，進而透視唐至北宋時期賓禮制度及其實踐的變遷。本文的內容涉及迎勞授館、戒見日、朝見、宴會、朝辭五項儀式的禮儀空間問題，其中最具象徵意義和實質內容的朝見儀式及其禮儀空間是本文研究的重點。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唐至北宋時期賓禮禮儀空間的變化既受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影響，也受對外形勢的左右。

除了相對次要的迎勞授館、戒見日禮儀在客館舉行外，朝見、宴會、朝辭禮儀皆在宮城內舉行。賓禮中的蕃使朝見禮儀與百官朝參固然有別，但是在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朝見禮儀。因此，賓禮的禮儀空間與日常朝會空間有很大的相關性，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變動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賓禮的禮儀空間。無論是唐後期蕃使來朝時正衙禮見、後殿對見的形式，還是五代時期蕃使朝見禮儀空間的前移，抑或是北宋的蕃使朝見禮儀皆在內朝舉行的事實，都在在說明了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變更對賓禮禮儀空間的影響。

如果說，賓禮的禮儀空間受皇帝日常政治空間的影響是具有共性的一面，那麼，唐至北宋時期賓禮禮儀空間的差異則與周邊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唐朝雖然不時面

臨四周強敵的挑戰，¹⁵²但是仍然維持了一元化的天下秩序。¹⁵³唐朝與周邊政權的關係主要通過冊封與朝貢來維持，即便是那些不接受冊封的國家，使者來華依然要朝見皇帝、上貢土物，以此來維持不對等的關係。唐代以蕃主和蕃使為單位來制定賓禮，禮儀差別主要出現在蕃主和蕃使之間，而非不同政權之間。蕃主和蕃使的禮儀差別在朝見禮儀上有突出表現。從禮儀空間的角度看，《開元禮》規定蕃主朝見禮儀在太極殿舉行，蕃使朝見禮儀的舉行地點則不明確；蕃主朝見皇帝時能夠升殿坐於皇帝身旁，蕃使朝見皇帝時只能立於殿庭中，通過通事舍人與殿上的皇帝溝通。不同政權的蕃使在賓禮上的差別，體現在朝見禮儀上黃麾仗和樂懸的有無上，這固然對儀式的規格有所影響，但是這些蕃使朝見唐朝皇帝時，在禮儀程序、禮儀空間上皆無不同。在唐後期蕃使朝見禮儀的實踐中，各周邊政權的使節也都是在同一宮殿朝見唐朝皇帝，只有肅、代時期的回鶻一度例外。在唐朝一元化的天下秩序下，各周邊政權在賓禮上的差別有限，這在禮儀空間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隨著周邊形勢的變化，中原王朝的賓禮制定原則不得不進行調整，周邊政權的強弱在賓禮上有了更加直觀的反映。五代時期已經出現了按照大蕃、小蕃確定朝見禮儀場所的觀念。宋朝建立後，試圖以武力為後盾，重建以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在禮儀上表現為《開寶通禮》大體沿襲了《開元禮》的賓禮舊制。實際上，北宋對此力不從心，不得不給予契丹使節特殊的禮儀待遇，並因為軍事鬥爭的失敗，最終接受了與契丹對等交往的事實。此外，西夏的崛起、拉攏高麗的需要，使宋朝面臨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根據不同的國家制定不同的蕃使來朝禮儀，是宋朝應對這種周邊局勢在禮制領域的反映。北宋以契丹、西夏、高麗、交州、宜州西南蕃黎州、海外進奉蕃客為單位制定來朝禮儀，禮儀空間也出現分化和差異。首先，因為外事管理、宿泊機構的分化，蕃使的迎勞授館、戒見日禮儀根據其來自的政權，分別在

¹⁵² 陳寅恪從「外族盛衰之連環性」的角度對唐朝周邊政權的興衰進行了高屋建瓴的探討，重在強調「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為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間之單獨性」。參見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128-159。

¹⁵³ 高明士對一元化、制度化的天下秩序在唐朝的成立有詳實的論述，參見氏著，《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31-159。

都亭驛、都亭西驛、禮賓院、懷遠驛、同文館等處舉行。其次，不同政權使節朝見禮儀的規格差別在禮儀空間上也有表現。契丹國信使的朝見禮儀明確在紫宸殿舉行，而且使團成員能夠分批次升殿，近距離面對宋朝皇帝。其他蕃使的朝見禮儀很多時候在後殿崇政殿或延和殿舉行，儘管也有在紫宸殿行禮的事例，但是要視其國與北宋關係的遠近來定，高麗、西夏使節朝見場所的變動證明了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契丹以外的使節一概無法升殿，只能立於殿庭中行禮。最後，北宋為契丹使節專門在宮中安排宴會，其他蕃使來朝只是被賜予酒食，可見待遇落差之大，這也使得契丹與其他蕃使禮儀空間的差異進一步凸顯。以上這些現象從禮儀空間的角度，體現了新的歷史環境下賓禮的調整，強化對不同政權的區分對待成為澶淵之盟後賓禮的首要特色。（責任校對：顏絃仰、蘇郁淇）

參考書目

A. 史料（依筆劃順序）

- 王欽若（宋）等，《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 王溥（宋），《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王溥（宋），《唐會要》，據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原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55。
- 王應麟（宋），《玉海》，據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影印，南京、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
- 王讜（宋）著，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元稹（唐），《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司馬光（宋），《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
- 成尋（日），《參天台五臺山記》，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8。
- 李林甫（唐）等，《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李昉（宋）等，《文苑英華》，據宋刊本及明隆慶元年胡維新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66。
- 李燾（宋），《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吳任臣（清），《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
- 辛德勇輯校，《兩京新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宋敏求（宋），《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金富軾（高麗）等著，末松保和校訂，《三國史記》，東京：國書刊行會，1971。
- 房玄齡（唐）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班固（漢），《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徐松（清）輯，《宋會要輯稿》，據民國二十五年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複製重印，北京：中華書局，1957。

菅原真道(日),《續日本紀》,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61。

脫脫(元)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葉夢得(宋),《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董誥(清)等,《全唐文》,據嘉慶十九年刊本縮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圓仁(日)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

鄭玄(漢)注,賈公彥(唐)疏,《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鄭居中(宋)等,《政和五禮新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歐陽修(宋),《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歐陽修(宋)等,《太常因革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宛委別藏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歐陽修、宋祁(宋),《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劉昫(後晉)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薛居正(宋)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蕭嵩(唐)等,《大唐開元禮》,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庫所藏光緒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刊本影印,東京:古典研究會,1972。

錢易(宋),《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

藤原緒嗣(日),《日本後紀》,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61。

蘇轍(宋),《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B. 專書

(一) 中文

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 王海燕，《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間與禮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 王靜，《中國古代中央客館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 平田茂樹著，林松濤、朱剛等譯，《宋朝政治結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李華瑞，《宋夏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袁剛，《隋唐中樞體制的發展演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 高明士，《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以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 梁滿倉，《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傅樂煥，《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湯勤福、王志躍，《宋史禮志辨證》，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
- 楊渭生，《宋麗關係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趙雨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官僚機構與等級之編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 黎虎，《漢唐外交制度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 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 聶崇岐，《宋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

（二）日文

- 古瀨奈津子，《日本古代王權と儀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 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 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國際秩序》，東京：汲古書院，1998。

吉田歡，《日中宮城の比較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

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劃》，東京：講談社，2001。

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會議——唐代聽政制度の展開》，京都：晃洋書房，2006。

金子修一，《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6。

森公章，《遣唐使と古代日本の對外政策》，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東京：柏書房，1996。

廣瀬憲雄，《東アジアの國際秩序と古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

藤善真澄，《參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6。

C. 期刊論文

（一）中文

王靜，〈唐大明宮內侍省及內使諸司的位置與宦官專權〉，《燕京學報》，新 16 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5，頁 89-116。

石曉軍，〈隋唐四方館考略〉，《唐研究》，第 7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2，頁 311-325。

朱溢，〈北宋外交機構的形成與演變——以官僚體制和周邊局勢的變動為線索〉，《史學月刊》，2013 年第 12 期，開封：河南大學、河南省歷史學會，2013.12，頁 33-42。

松本保宣，〈從朝堂到宮門——唐代直訴方式之變遷〉，收入鄧小南、曹家齊、平田茂樹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237-306。

郭湖生，〈麟德殿遺址的意義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 年第 11 期，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1.11，頁 619-624、630。

曹家齊，〈北宋熙寧內諸司及其行政秩序——以參與接待成尋的御藥院和客省為中

心之考察》，《北京大學學報》，2011 年第 2 期，北京：北京大學，2011.4，頁 131-140。

曹家齊，〈宋朝對外國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參天台五臺山記》為中心之考察〉，《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11.8，頁 109-124。

黃純豔，〈雍熙戰爭與東北亞政治格局的演變〉，《史林》，2010 年第 6 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10.12，頁 53-59。

遠藤隆俊，〈文書中所見宋朝對日本使客之接待——以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為題材〉，收入鄧小南、曹家齊、平田茂樹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680-699。

劉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復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 年第 7 期，北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3.7，頁 385-402。

（二）日文

辻正博，〈魏晉南北朝時代の聽訟と録囚〉，《法制史研究》，第 55 號，東京：法制史研究會，2006.3，頁 1-55。

石見清裕，〈唐の國書授與儀禮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 57 卷第 2 號，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98.9，頁 243-276。

田島公，〈日本の律令國家の「賓禮」——外交儀禮より見た天皇と太政官〉，《史林》，第 68 卷第 3 號，京都：史學研究會，1985.5，頁 369-420。

金子由紀，〈北宋の大朝會儀禮〉，《上智史學》，第 47 號，東京：上智大學史學會，2002.11，頁 49-85。

妹尾達彦，〈隋唐長安城の皇室庭園〉，收入橋本義則編，《東アジア都城の比較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頁 269-329。

朱熹／唐至北宋時期賓禮的禮儀空間